

# 资料与研究

ROSA 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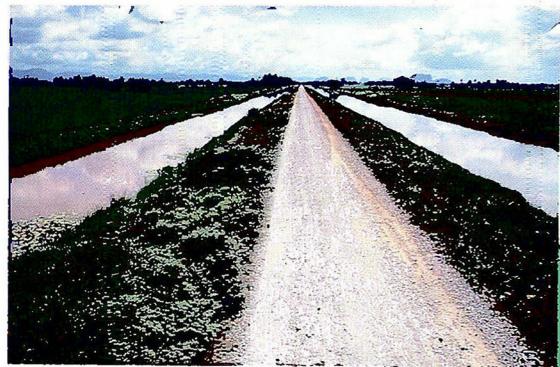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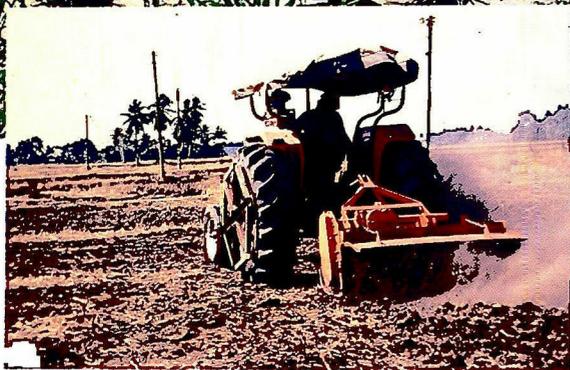
1994年7月1日

KDN PP 7865 / 2 / 94

ISSN 0128 - 8369

- 翻掀绿涛万顷 / 何乃健
- 政治科学的核心是真抑或善? / 祝家华
- 光一样的人 火一样的历史 / 辛金顺
- 《梅花峰》上  
剑气纵横 水袖翻飞  
各有道理 心怀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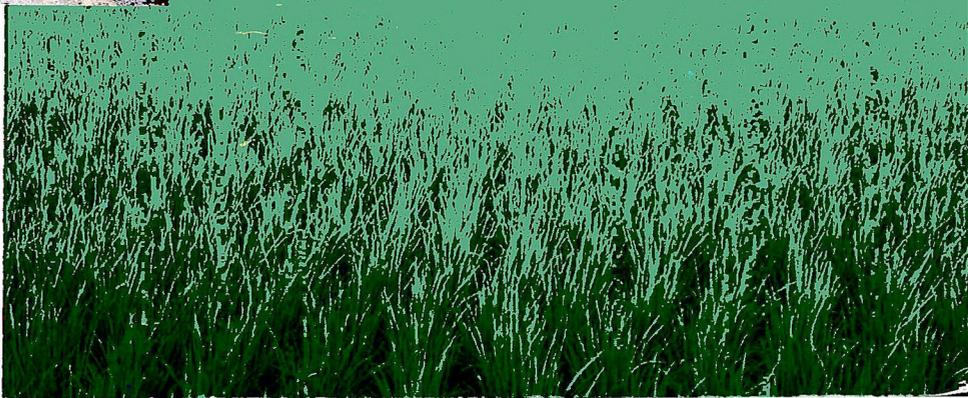
- ① 天气干旱，土地龟裂，稻秧即使没枯死，但对收成势必带来巨大影响。
- ② 以机械犁地翻土，节省劳动力，又节省时间。
- ③ 灌溉的水道，为大地挂上亮光闪闪的银链。
- ④ 一片焕发出欢悦而充满活力的稻秧为田园换上绿装。

①

②

③

④



# 編者的話

我国摆脱英殖民统治，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后，由于我国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各方面的因素，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一直都处在良好的状况。三十多年来，国家建设、社会面貌，一再翻新，而人民的生活更普遍获得大幅度的改善与提高，安居乐业，成为其他许多国家人民所羡慕与赞赏的对象。

我国独立后，在各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以及在资源开发等所取得的成绩，在好多方面，都成为世界重视的焦点，而且发生一定的影响。在吉打北部与玻璃市南端的稻田，开发建设的慕达水稻灌溉设施，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骄人的建设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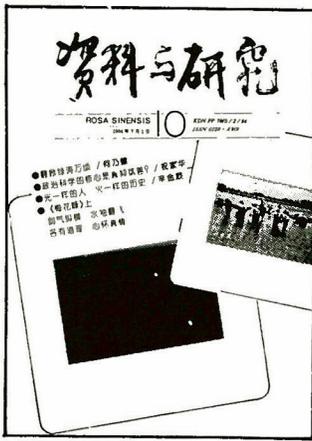
本刊特邀请水稻专家何乃健硕士撰文，展现绿涛翻掀，稻香飘散万顷大地的景象；全面地介绍了慕达水稻灌溉区的建设过程，改革稻种与播种方法，提高生产与农民收入，以及在进行的科学研究对世界水稻种植的影响。

何乃健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他曾写下了好多的诗篇与散文，为祖国这一方美丽的田园抒情讴歌。本刊特转载了他以《禾浪短笛》为总题的系列散文中的三篇，以飨读者。

你若将视线由《焦点》移开，我们呈现给你的专论有：《政治科学的核心：是真抑或是善？》（祝家华）、《略谈蔡元培对女子与美学教育的改革精神》（蔡玫姿）与辛金顺的《光一样的人，火一样的历史》，谈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本刊在连载的《砂劳越华人》，有了回响。安焕然引经据典，就《郑和有到过砂劳越吗？》，提出精辟的看法与严谨的论证。《寻根溯源》还有苏庆华的《漫谈堂号之创立及其历史，时代意义》。

在《梅花峰》上剑气纵横，水袖翻飞，五位名家高手的议论与抒情，激昂与委婉，在在是道理，处处有真情。



# 资料与研究

ROSA SINENSIS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出版人：叶新田博士  
 编辑：《资料与研究》编务谘询委员会  
 何维斌（召集人）、朱自存、  
 张景云、李业霖、罗正文、  
 陈应德博士、陈忠登医生、  
 苏庆华、游若金博士  
 主编：陈恩庆  
 封面题字：何维斌  
 美术设计：叶玉佩 / 林碧凤  
 封面图片：何乃健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资讯部  
 发行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承印：万兴印务贸易有限公司  
 No 3, Jalan SR 3/6  
 Taman Serdang Raya  
 Seksyen 3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Darul Ehsan

出版日期：1994年7月1日  
 定价：RM5.00  
 KDN PP 7865 / 2 / 94  
 ISSN: 0128 - 8369

所有来稿反映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 ■ 编者的话

## ● 焦点

### 4 翻掀绿涛万顷

——慕达灌溉区缩影 / 何乃健



## ● 梅花峰

14 浅剖华堂选举 / 刘锡通

16 跷跷板的两端 / 永乐多斯

17 绝症 / 甄供

18 对家庭暴力法律的质疑 / 张碧芳

20 拿出魄力对付香烟广告 / 陈锦松

# 錄

## ● 专论

- 23 政治科学的核心是真抑或善？  
——对有关当代政治科学之  
评论的一点反思 / 祝家华
- 28 略谈蔡元培对女子与美学教育的改革精神 / 蔡玫姿
- 33 光一样的人 火一样的历史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 辛金顺

## ● 新闻橱窗

42 - 48

## ● 寻根溯源

- 49 漫谈“堂号”之创立及其历史、时代意义 / 苏庆华
- 52 郑和有到过砂劳越吗？ / 安焕然

## ● 文摘

- 58 张爱玲、颓废与世纪末 / 李欧梵
- 62 棋子人生 / 刘再复

## ● 医药知识

- 64 禁食月的生理变化 / 马大医学院病理学庄思麟教授

## ● 翻译

- 65 《砂劳越华人》第六章  
——一八六三年至一九四一年华人移民与农业发展  
/ 陈振声撰 ● 黄顺柳译

慕达灌溉区缩影

# 翻掀绿涛万顷

■何乃健



## 耕耘种稻历史悠久

马来半岛西北端沿海一带的沼泽地，大约于公元1世纪狼牙修立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水稻在河岸与洼地里疏落栽植的痕迹。作物学家相信，水稻最先通过海上贸易的航线，由南亚或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传入马来半岛。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水稻的传统栽培技术，在15世纪时从暹罗传入。到了3百多年前，大面积的水田，已在吉打北部与玻璃市南端的大平原里出现。这大片目前归入慕达农业发展局管辖的稻田，于1949年时已成为马来半岛最主要的稻产区。

在慕达水利计划还没有推行以前，农民只能在7、8月份雨季带来足够的水份时，才开始耕耘、育苗、插秧，然后在翌年的正月或2月收割。由于缺乏水供，从2月至6月的旱季里，农民只好休耕，在家憩息。在当时，慕达区中的6万馀户农民，绝大部分只拥有1点4公顷的田地，单靠稻米的收入仅够糊口，若发生水灾或亢旱，稻谷欠收，农民的生活就立即陷入水深火热中。在60年代中期，百份之七十二的稻农生活在贫穷线下，日子捉襟见肘。

## 四年建设面貌一新

为了提高稻农的收入，以及在白米生产方面达到自供自给，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向世界银行贷款，建筑慕达（MUDA）与柏都（PEDU）两个大水坝，并且在9万7千公顷的水田里，开浚2千馀公里的灌溉水道与排水沟渠，与1千馀公里的田间道路。慕达水利计划于1965年动工，经过漫漫4年徐

的建设工作，终于在1970年的旱季开始进行双季稻的种植。慕达灌溉计划共分五个阶段来推展，由于策划周详，预备工作完善，至1974年，整个慕达区内百份之九十二的稻田已能够种植双季稻。每年单位面积的谷产，从60年代末期的每公顷3公吨左右的收成，提高至70年代末期的9点5公吨，在短短10年期间，增产超过3倍。每个农户的年均收入，由60年代中期的1千零九十二零吉，提高到1975年的4千零吉，整个慕达区内的贫穷率随之而显著降低。

回顾过去20馀年双季稻的发展与推行，肯定能帮助我们去认识与了解，前辈们胼手胝足地开拓这个庞大灌溉计划的困苦和艰辛，并且从前人经过多年奋斗而累积的丰富经验中，获取灵感和启示，以更大的毅力与信心，向充满挑战的21世纪迈进。

## 孕穗开花日照左右

马来半岛在日治时期，开始尝试双季稻的种植。当时来自日本的占领军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从台湾引进了三个对光周期不敏感的稻种，在旱季里种植。水稻属于短日性植物，由于当时所有在马来半岛的传统栽培稻，都具有对短日照敏感反应的特性，所以当夏季日长夜短时，这些稻种将继续停留在营养生长的阶段，延迟开花、结实。日照随季节递换而逐渐短缩，直至日短夜长时，这些传统水稻才能进行生殖，孕穗开花。台湾引进的稻种由于对日照不敏感，所以在夏季也能正常开花结穗。这三种台湾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米质欠佳，种植的面积因而大大缩减，除了



在威省、居林河与慕达河岸一带的少数农民，仍继续以这些稻种来种植双季稻之外，其他地区里已少人问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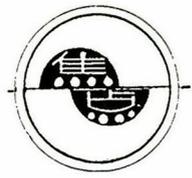
## 绿色革命改良品种

196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马来西亚农业部在绿色革命的酝酿期里宣布，成功进行品种改良而推出一个适合在本地进行双期作的新稻种：马琳雅（Malinja），并于翌年再推出另一个品质更优良的稻种：马苏里（Mahsuri）。在同一个时期，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与福特财团于1962年在菲律宾建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育种工作之后，培育出矮秆、抗倒伏、早熟、高产、生育期仅一百二十天左右的奇迹稻：国际稻八号（IR8）。我国也引种了IR8，并且为之取名为快活稻（Padi Ria）。慕达区在1967年推行大规模双季稻示范种植时，曾鼓励农民尝试栽植奇迹稻。

## 惧拖拉机吓跑稻魂

虽然水稻矮化育种，取代了千百年

来传统的高秆稻种，以及由单季稻转变成双季稻，把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是水稻发展史上两项重要的突破，不过，要慕达区内惯于依据传统方式生活的农民，把旧的耕作方法放弃，全盘接受崭新的科技，在60年代中期，曾面对强大的阻力。一向依靠水牛犁田、整地的稻农，迷信耕作机械化之后，拖拉机会把守护禾苗的稻魂（Semangat Padi）吓跑，使稻作欠收。稻农也担忧第一期作的谷子，在7、8月成熟时，因为雨季莅临，来不及晒乾而萌芽，造成血本无归。农业部为了加强农民对双季稻种植的信心，成立了国家稻米局（LPN），以每担保证不少过十六零吉的谷价向农民收购稻谷，并且在各地设立了多个烘谷中心来解决湿壳的问题。农业部也同时设立了农业银行，提供贷款予稻农购买机械、肥料、农药。此外，慕达农业发展局（MADA）将整个灌溉区划分为27个行政单位（Locality），在每个面积约4、5千公顷的单位里建立一间农民协会，为每个单位中约2千户农家，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各种生产与销售的便利。农会的组织也把农民的资金汇集起来，向农商领域进军。



60年代末积极进行的农业推广活动，改变了许多农民消极的态度，为双季稻的成功种植铺路。

## 科技成果农民振奋

70年代见证了新科技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把稻谷生产推向一个令人振奋的高潮。这10年期间最大的改变，是灌溉设施建立后提升了耕作密度，新的稻种也逐渐全面取代了传统的品种，拖拉机被广泛应用，肥料与农药被接受为达至高产的重要因素。

在品种改良方面，国际稻5号（IR5）取代了国际稻8号，在慕达区里以新的稻名：幸福稻（Padi Bahagia）介绍予农民，并且获得热烈的反应。此外，于1973年由菲律宾引进的另一个稻种C4-63，也以成功稻（Padi Jaya）的名称出现，广泛培植于慕达区里。由本地育种专家培育出来的稻种：1千千冬（Seribu Gantang）虽然未经正式推介，在70年代中期，却成为稻农的新宠。单单在1977年，1千千冬这个稻种已在慕达区内百分之七十六的水田里栽种。这个优良的新品种具有高产及耐酸质土壤的特性，所以在土质有问题的地区，特别受到农民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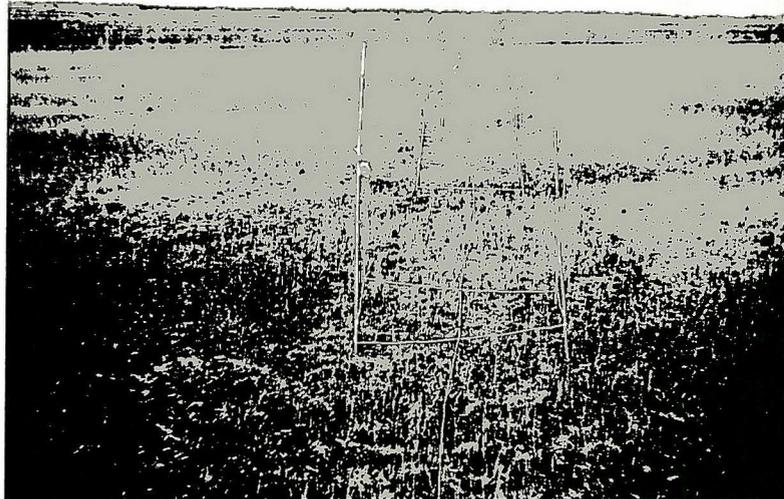
## 亢旱害虫重重挑战

在70年代里，慕达区的农民面对了两个重大的挑战：由于亢旱持续，慕达与柏都水库里的蓄水降低至危险水平。负责管理这个全国最大米仓的慕达农业发展局（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MADA）宣布

：1978年第一季稻被迫停止种植。当局推行了一系列救灾的补助计划：贫农可以向MADA登记，参与清理灌溉沟渠的工作，以及在农会中养鸡，种植蔬菜，玉蜀黍等短期作物。农业部共动用8百万元来进行这项纾缓民困的救灾工作。

翌年的第一季水稻，原来很少在马来西亚的水田出现的褐飞虱与白背飞虱，突然在绿禾间崛起，成为危害最烈的害虫。褐飞虱不但刺吸稻汁，造成植株乾枯，稻穗萎缩，瘫痪倒伏，而且还能传播严重妨碍水稻正常生长的病毒。在慕达区里，大约2万1千馀公顷的水田受到这两种昆虫的威胁。为了克服虫害的问题，慕达农业发展局出动了直升机来喷射杀虫剂。快速的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阻止了虫害蔓延，拯救了大部分正在成长的稻禾。受到严重损失的稻田，仅3百馀公顷而已。

1979年第二季稻，政府宣布给予稻农肥料津贴，令全国的稻农欢欣雀跃。那一季水稻的单位产量达到了4点8公





顿，全年每公顷平均产量高达9点5公顿，创下了双季稻在70年代最高的收成。

## 采直播法突破传统

在80年代初期，联合收割机（Combine Harvester）经过了不断的试验与改良之后，已在慕达区里普遍取代了手作收割，大大减少了人力依赖。联合收割机也使到直播田里的收割难题迎刃而解。由于工业化计划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外流，

# 一散千里的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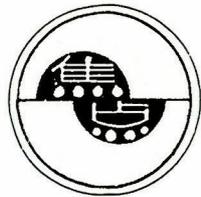
■何乃健

有关水稻的发源地，众说纷纭。近代研究作物起源的科学家认为，在作物的发源地里，遗传显性的形质必然比较多，而且作物的变异也比较繁复。由于栽培稻的起源，是经过野生稻的进化而逐渐形成，因此，野生稻品种丰富，形态变异多端的区域，很可能就是水稻最先为人类驯化种植的地方。根据上述的理论，水稻的发源地，可能在印度东部，中国的云南，或者泰国与缅甸北部的山谷里。在神州大地，

水稻的栽培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水稻与中华民族亲密的关系，鲜明地映现于新石器时代陶土上的稻谷压痕里。在神农时代，稻已被列为五谷之一。司马迁在《夏禹本记》里明确地记录着：“禹疏九河，会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民食稍调。”可见稻作在数千年前，已被勤奋的中国农民普遍栽植，在龙族文化中高居重要的位置。

在各种主要食用作物中，稻作具有最广泛的适应性，在赤道附近的海岛，蕉

风、椰雨和稻浪，是农村旖旎的写照。位于中国东北的漠河，有证据显示，在北纬五十三度，刻苦的农民曾经在酷寒中种稻。低从沿海的河滩，至高达二千五百米的云贵高原，都可以见到，稻穗绽放金黄色的微笑。在低洼的盆地，与常被洪水泛滥的三角洲，浮稻为了适应环境，稻茎可以迅速伸长，探出五、六米深的水面、随风轻摇。在缺水的山坡，旱稻以特别发达的根系，在土中扎牢，把秆茎内的含水量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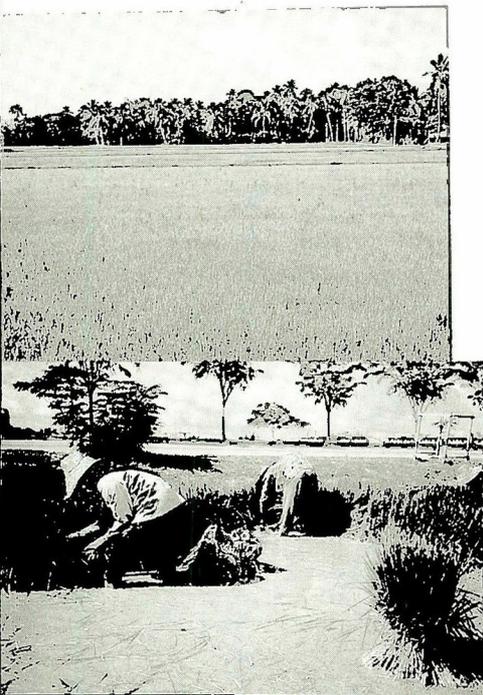
造成了慕达区内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农民为了克服这两个问题，开始转向直播法，以取代传统的插秧法。这个重大的转变，促使马来西亚在发展直播的耕作技术方面，在这个区域里遥遥领先。

慕达区里推行的直播法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乾田直播与湿田直播。因为水源不足，乾田直播在第一季里，经过乾犁之后播种，再由雨水催苗，然后才灌水入田，能大量降低水份的消耗，并且能够在水库缺水时，仍然可以继续种稻。最明显的例子，是1987年的第一季，两个水库因为亢旱造成水位骤降。这个困境与1978年的亢旱无异，然而

78年时的耕作法以插秧为主，灌溉停顿后，农民无法在秧田育苗，结果无法种稻；在87年，农民以乾田直播来取代秧田育苗，灌溉虽然停顿，田里的稻禾仍然可以靠雨水生长。不过由于禾本科的杂草丛生，野稗、畔茅、盖谷草蔓延，87年的收成每公顿平均只获得2点7公顿。然而，与9年前亢旱时颗粒无收比较，这个水平的收成已属难能可贵。

## 红稻病曾带来灾害

80年代初期，慕达区内曾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天灾：由黑尾浮尘子（亦称黑尾叶蝉）传播的红稻病，在1981至84



高，无畏地去面对亢旱漫长的煎熬。

稻作坚韧的适应能力，常常使我联想起中华民族的刚毅。稻米从最初的起源地，渐次传播于全世界每个大洲的农田里，就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华裔，历尽艰辛，胼手胝足，拓殖异域，在毫无政治与经济支援的困境中，逆流而上，巩固民族文化的根基，在风雨飘摇中仍然昂然屹立。每当我阅览稻作的传布图，我就隐约窥见我们的先民怀抱着梦想，为了摆脱恶劣的命运，追寻未经开垦的沃土而迁徙。他们的血和泪，都汇入地图中的每一道经和纬！

我的书桌上搁着一本水稻研究的书籍：《向2000年及未来继续探险》。想起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台湾诗人罗青的“水稻之歌”像田里一只白鹭，在我脑海中振翅而起：

.....  
我们兴高采烈地，前后看齐  
把脚尖并拢，手臂高举  
迎着和风，成体操队  
散——开  
一散，就是  
千里！

我的眼眶滚动着泪，朦胧里，鸦片战争之后的漫长苦旱渐渐消逝，我们殷切地期盼着，一散就是千里的缘意！





年，共造成 2 万馀公顷的水稻受到感染而严重欠收。红稻病在马来西亚称为 *Penyakit Merah*，与印尼的 *Penyakit Habang*，以为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的东格鲁病（*Tungro*）同属一种病害，由两种病原的病毒，即球状颗粒与杆状病毒引起。染病的禾苗叶黄化与植株退化，完全不能结实。红稻病的蔓延，造成慕达区的平均稻产由每季每公顷 4 点 5 公吨，逊退至 3 顿左右。农民的每户平均收入，也由 75 年的 4 千零吉下降至 82 年的 3 千 5 百馀零吉，很多农民在困境中只好依靠借贷渡日。

水稻病虫害、杂草、以及水供短

缺，是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期里，稻农面对的最大威胁。慕达农业发展局为了隐定稻谷的生产，以及维持水田生态的平衡，决定采取数项重大的措施，并加强对农民的训练工作，以期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决策，是向农民宣布：每年 2 月的乾旱期里，水库不再施放水供，所有农民必须依照慕达农业发展局与农民领袖磋商后，决定的耕作时间表操作。停施水供以促使农民休耕 1 个月，不但能控制病虫害蔓延，也能有效节制耗水量，以及方便农民晒田，使土壤坚实，农业机械在软土中深陷的难题因而减少，生产资源效率也获得提高。

## 奇迹稻的奇迹

■何乃健

水稻起源于沼泽地带中自然繁衍的野生稻，经过很多世代的不断驯化与人工栽培，逐渐演变为不同特性的品种。水稻属于短日性植物，很多传统的栽培稻，都具有对短日照敏感反应的特性，也就是说，当夏季日长夜短时，这些稻种将继续停留在营养生长的阶段，延迟开花与结实。日照随季节递换逐渐短缩，直至一定的程度，才能促进水稻进行生殖，开始幼穗分化，孕穗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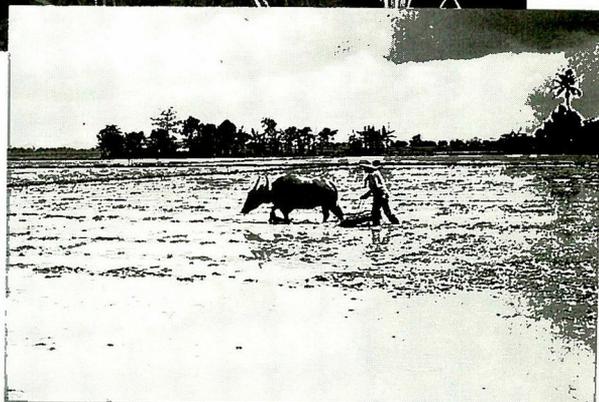
花。由于传统水稻的生育期漫长，因此不利高产。为了配合双季稻的拓展，研究重点必须集中于稻作品种的改良。高产的良种被喻为绿色革命的原动力，没有良种来带动，化肥、机械与水利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所推行的绿色革命，焦点即作物品种的改进。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在 1966 年 11 月所推出的奇迹

## 培育新种恢复信心

此外，通过与其他国内与国外的农研机构的协作，新的稻种如国际稻 42 号（IR42）与本国培育的 MR84 号等优良的品种，由于抗病力强，产量高而稳定，使农民对双季稻的种植恢复了信心。

在水利发展方面，人造雨的试验，新水库的设立，灌溉系统的改良，水道密度的提高，农田用水的再循环，以及积极推行减少用水的乾田直播法，通过恰当的互相配合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红稻病自 1985 年起，已在慕达区



稻——国际稻八号，就是稻作品种改良的第一个高潮。这个稻种的特点，是秆茎矮硬，生长期短，分蘖力强，根系发达，耐肥抗倒，叶片上举，透光性能好，光合作用效率高，通过恰当的施肥与栽培，穗大粒多，单位面积产量可以高达一般热带传统水稻的两倍，甚至三倍。奇迹稻在提高稻产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主要因素是育种成功，让高产但是易倒的印尼“北达”稻种，与台湾的矮秆抗倒品种“低脚乌尖”互相配合，为农业生产领域作出新的开拓。

然而，奇迹稻所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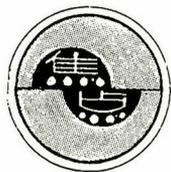
奇迹，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劳永逸，永远解决所有生产的问题。因为一个新的品种经过大面积的长期种植，对病虫害的抗性就逐渐丧失。如果不经常更新换代，很可能在病虫害大暴发之后，连一粒谷种也长不出来。奇迹稻在许多农民的田里，很快就失去了它在研究所和示范田中焕发的异彩。原来奇迹稻必须适当的灌溉，才可以把高产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人，只能依靠雨水来耕作，因此经常面对缺水的威胁。加上奇迹稻高度分蘖，密集的梗与叶，吸引了更多病虫

害，到来把稻株破坏。

科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如果稻的品种太过单一，稻作面对的风险将大幅度升级。

我从奇迹稻兴起与落没的过程中，体悟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哲理：要开创新的境界，就不能自我封闭。唯我独尊，排除异己，忘了奇迹的出现，需要人和、天时、与地利，那么，奇迹只能在昙花一现之后，化成了平凡的尘与泥！





内消声匿迹。从 1989 年至 93 年的第二季稻，平均稻产已提升至每顷可以收成与公吨以上。许多稻农在 60 年代初的收入，买不起一辆脚车，在 90 年代里，稻农平均年收 9 千馀零吉，贫穷率下降至百分之十八，属于赤贫的农民只有百分之五；几乎每户都有摩多单车与电视机，不少农民还拥有汽车，以及各种家用电器。

## 迎接廿一世纪挑战

从过去 20 馀年的观察与实践，水稻工作者深切的体会到：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气候的异常，农民人口老化与外流，将使到谷物的供需矛盾越来

越尖锐。农业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破坏，将会造成生态变化。昆虫学家也深切了解，水田里许多天敌，会因农药的大量施用，而受到伤害，并且造成人为的灾难。因此综合生物防治等概念，必须被普遍接受，积极在农村里推展。

在下个世纪里，农田管理逐渐园丘化与企业化，将可以减轻小农户因人力短缺而带来的压力。到时，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也会因为农村工业的推行，而不再遥不可及。

许多生物学家预言：21 世纪，将是生物技术革命的蓬勃期。通过遗传改良工作，将能培育出光合作用与吸取养分效率很高的稻种。这些新品种的水稻，

# 从稻的换种想起

■何乃健

在中国的浙江省，考古学家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以及数量繁多的翻土农具，从而证明了在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已经掌握了水稻栽培的基本技术。刻苦耐劳的先民，从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深切明了稻种的重要。每个农民都知道：“一粒好种，千颗好粮。”优良的品

种基本上必须达到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以及成熟早。

但是一个好的稻种，在同一块田地里连续栽植多年，就会逐渐出现退化的问题，稻穗与谷粒渐渐变小变轻了，植株也长得高低不齐。好的稻种会产生变异，因为在收割、打谷、储藏、播种的过程中，没有妥善的

处理，造成谷种混杂，纯度降低。此外，不良环境条件，与不正确的栽培技术，还有稻种之间的自然杂交，引起水稻遗传性的改变，促使后代分离。一些有关种子的农谚，精辟地反映了这个自然的规律：“三年不选种，增产要落空”，“良种种三年，不选就要变”。

然而在求变的过程中，有的农民操之过急，结果带来了农田生态系统的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农业科技被广泛应用，稻种渐趋单一化，许多传统的品种与旧的育种材料，被无知地抛弃。杀草剂被盲目滥用，造成许多野

## 何乃健简介

马华文坛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何乃健，他是我国慕达农业发展局的一位水稻专家。

何乃健 1972 年在马大攻读农科毕业，留校及在沙登农学院担任助教约半年，就到慕达农业发展局任职至今。

他曾受国际水稻研究所邀请到中国作翻译工作。他也曾为联合国粮农机构，以英文编写杂草管理教材。

在过去，他总共撰写了八十篇有关水稻问题的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与专业刊物发表。

产量高、抗性强、品质好，每一季可以在 1 公顷田里生产 10 至 12 公顿的稻谷。慕达农业发展局已定下一个大目标，要在公元 2 千年时，达到每季平均谷产每公顷 6 顿的收成。从科技发展的观点来衡量，这个目标不算过高，只要慕达区内 6 万 3 千个农户，都能以过去克服万难的精神，不屈不挠，积极向前迈步，比上述目标更高的收成都能够达到。

只要有决心，这片半岛北端的大平原，每一季都能在收割时，掀起金涛万顷。

16 / 5 /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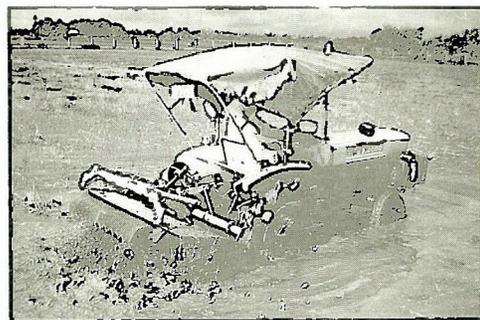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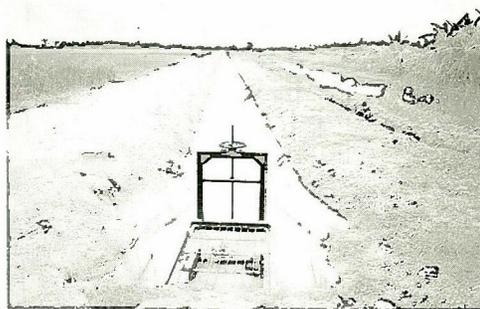
生资源消声匿迹。此外，大规模的开垦，毫无节制的填土活动，大大的破坏了稀有品种资源，以及可供他们繁衍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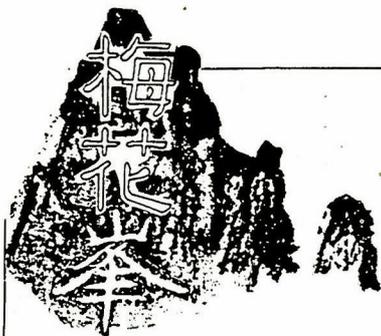
为了防止品种退化，以及加强稻种对各种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科学家发现许多传统的稻种，以及野生群落中的品种，具备很强的抗旱、抗病、抗虫，以及各种抗逆性的特点，只要善加利用，择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的稻种互相配合，改进品质，提高产量，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佳绩。

水稻的品种必须不断更新，而文化也一样，如果不能与时并进，注入新的激

素，这种文化就会逐渐僵化，花果飘零。然而，如果在求变的过程中，对外域文化趋之若鹜，全盘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旦盲目地紧紧拥抱的外来文化出现了缺陷与危机，才赫然惊觉，自己已退化成完全丧失了抗虫、抗病、抗自然灾害的杂交稻种，失去在困厄中生存的能力，那时将永远懊悔莫及。

当科学家们正积极的从传统的品种与野生资源中，选择优良的材料来改良与培育新种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积极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来面对前路的风雨和苦旱呢？





■张碧芳

# 对家庭暴力法律的 质疑

在马来西亚，第一宗家庭暴力事件不知在何时发生。但“我们需要家暴法律保护妇女”之声，却是在1985年正式响起。

有个民间自愿团体组织叫AWAM，即“马来西亚妇女醒觉运动”。这些年来，AWAM的成员们在妇女权益的争取上，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而家暴法律，正是她们近几年来所努力想获取的一个妇女运动成果。

在AWAM以及其他较激进民间团体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国会终于在1994年5月12日正式通过了《1994年家暴法令》。

尽管说“迟到好过没到”——这项家暴法律似乎未能真正激起我国绝大多数女权运动份子的振奋与欢呼，因为，从“女性尚属弱势”之视角来看，这项法律

并未能真正、有效提供一面法律保护网来使无助的女性受害者脱离苦海。

众所周知，“求助无门”一直是家暴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最大的困境。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以及“有冤告就有法律援助”之原则，法律应该确保警方在面对家暴案件时，有权力加以调查。

然而，我国的1994年家暴法律，却忽略（抑或是有意闪避？）了这个问题，并未赋予警方法律负责去处理家暴案件，除非受害者的伤势极为严重（grievous hurt），或是暴力涉及到危险武器（dangerous weapons）或动粗方式极为危险（dangerous means）。

换言之，法律的考量是：“你伤得有多重？”“他用什么来攻击你？”而不



■张碧芳

是：“打人原本就是一种过失”、“打人本来就是一种罪过。”

《1994年家暴法令》实际上并未将家暴列为罪行，而是很巧妙地将我国的刑事法典(Penal Code)的殴打法律条文套用在家暴情况内。

在刑事法典下，第324、325以及326条文分别规定，若以危险方式/武器自愿致伤他人，或者严重致伤他人，警方有法律责任进行调查工作。换言之，若暴力并不在这三条法令定义之内，除非主控官另有书面指示，警方可以如以往那样，无须处理家暴投诉案件。

诚然，《1994年家暴法令》很清楚显露了一个传统文化的流弊，即“无论怎么

说，都不该将家事告上法院”之心态。

问题是：一个女人长期被丈夫拳打脚踢，算不算是被“严重致伤”？被丈夫以两伞或碟子攻击，算不算“危险武器”？

同样的，一个男人长期遭到太太以指甲抓伤，或以“粉拳”对待，他是否可以得到家暴法律的庇护。

从人的尊严及婚姻品质的角度来看，这法令委实有荒谬的一面，法律似乎在告诉受害者：“不行！等你真的头破血流了再来吧！”

令人费解的是，《1993年儿童保护法令》无须借助刑事法典，便能教致暴者罚款、坐牢，何故在婚姻暴力处理上，处理的手法却是截然不同？做父母亲的，莫非他们的权利与生命不及子

女的珍贵？

这法律在正式通过之前，曾受到好几位男议员的反对，理由是：“那会导致家庭的破碎及离婚率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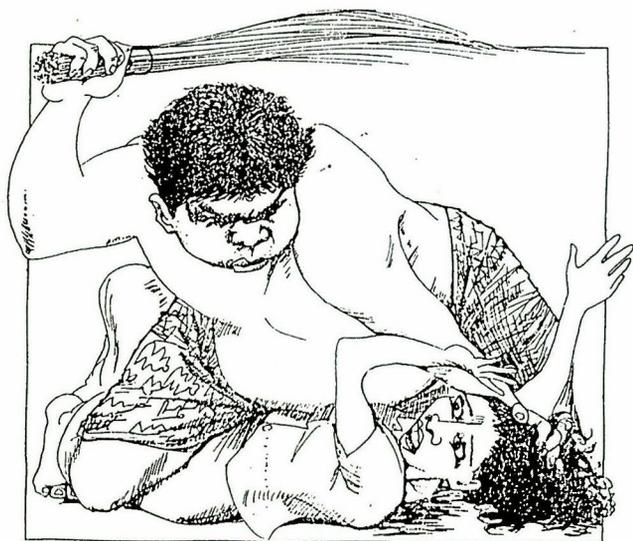
每当涉及到两性问题的处理，只要有人尝试做一些伸张正义或比较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工作，反诬的声音必然会响起，如“子女定会受累”、“家庭和谐会遭到破坏”等。可是，对这之前的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件之发生（如殴妻虐夫），却未见同样的人及时大声呼喝：“那会使到家庭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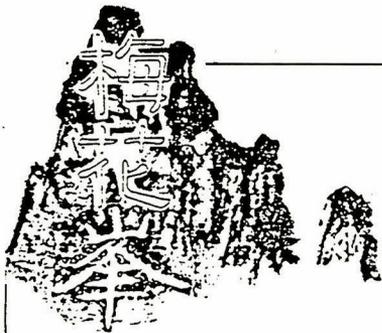
僵化的思维只会导致因果的颠倒，这不但不能维持“幸福美满的家庭”，还会混淆人们（尤其是孩子）的价值观。

从《1994年家暴法令》，我们可以再次印证一句话，就是：法律总会有漏洞，而且它似乎永远追赶不上生活及生命的蜕变。

这也正好说明了宗教情操与道德教育永远是合时宜的事实。重视人格发展，懂得尊重别人生命者，不论有没有家暴法令的存在，都会确保“家无恶人”，都会认同“生命是尊贵”说法。

尽管我们没有一流的法律，但谢谢天，我们有权做一流的公民，一流的夫妻，以及一流的父母……。





■ 永乐多斯

## 跷跷板的 两端

■ 永乐多斯

佛罗依德曾经说：虽然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去研究女人，但至今我仍然无法解答这个重大的问题：女人究竟要什么？

女人究竟要什么？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除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枷锁急待破除，心理方面女性也需要享有自由，爱与被爱以及成就感。香港女作家纪文风以广告界的眼光分析八十年代的女人，她认为：“今日全世界的女人都在蜕变，虽然蜕变的速度及程度不同，但基本上，她们仍然以追求婚姻家庭作为幸福及理想的保障。不过，在另一方面，她们却拼命去排除男性统治社会的传统观念，努力为自己建立事业，并且追求工作上的满足和成就。”

纪文风的观点很能代表这一时代女性的心声。她们

受过教育，渴望能在职场上拥有一片天空，要不然起码也能让自己经济独立，不要作丈夫身旁的“伸手将军”。不过，在工作上努力之事业的心理，让女性时感矛盾，时觉压力。美国心理学家史洛利·布洛特博士把它比喻为跷跷板：一端是事业，另一端是家庭生活。外在的压力常常迫使女性只能二者选一，真要两全其美，女性往往必须面对，也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

独立初期，女作家的小说中不常见到这类困扰，因为她们一方面受传统洗脑，只知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女性普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随着社会的迈向工业化，教育的普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女性希望能享受工作的成就感，经济独立的自由，而她们的喜悦，痛苦、困扰，70年代以后，慢慢地都被女作家收入作品中加以发挥、揣摩。

在父权社会还没完全转换成两性平等社会之前，做

一个职业妇女兼顾两头的确非常辛苦。在工作方面，她得以坚强的毅力，无比的智慧与勇气去克服男性对女性歧视的眼光，而与此同时，她也得克服自己的成功恐惧症。因为女性表现太好，不是受到排斥便是诽谤，使得不少女性不敢把能力发挥到底。再说，性骚扰存在于所有的工作场合，在饭碗与尊严之间作选择，女性只有无语问苍天。

在家庭方面，女性被赋予的母性天职，女性乐于扮演。但是，社会并没有给予女性支持与配合。人口政策鼓励女性生育，但是托儿设备明显不足，产假，照顾婴儿，幼儿假期，以及弹性工作时间制都没有落实。女性在建设国家社会的过程中要贡献心力，在照顾家庭孩子的工作中也要牺牲、奋斗，无人支援，甚至还要遭受男性“谁叫你不乖乖待在家里”的嘲笑，这种待遇，这种痛苦逼得女性只有家庭与事业中二者选一，而这种抉择，不但产生了不快乐的女性，也造成了国家、社会的损失。

从男人在上到男女平等，明显的还有一段路要走。跷跷板如何平衡，不只是女性，也是整个社会需要深思的问题。



# 拿出魄力对付香烟广告



■陈锦松

## ■陈锦松

吸烟危害健康，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但对吸烟者而言，这句话并没有任何的阻吓作用。吸烟与否原就是个人的权利，但若吸烟者只顾吸烟而完全不顾不吸烟者的感受，那他们的吸烟行为就应受到限制与约束。

我国政府五月十五日起全面实施的“1993年烟草管制条例”对不吸烟者而言应是一大喜讯，在该条例下，所有公共场所，包括娱乐场所（迪士哥、卡拉OK与夜总会除外），如戏院、医院、诊所、冷气餐厅（至少占餐厅的一半），公共电梯和公共车辆等，实行全面禁烟，违反者可当场罚款五十元至一千元。此外，该条例也严禁十八岁以下者购买香烟，同时禁止国内传播媒体刊登香烟广告，国外进口的报章，杂志也在管制之列。

新加坡在禁烟方面向来十分积极，该国早在1989年11月就规定大部份有空气调节的公共场所都被列为禁烟区，此外，新加坡政府

也严禁香烟广告，这方面他们远做得比我国彻底。在该国的《吸烟（禁止广告）修正法案》中禁止烟草业和销售商在广告、车辆、纪念品和礼物上印制或提到烟草产品的牌子、标志或商标。法令也规定，任何人售卖商品时不得以香烟作为免费礼物，卖香烟也不得附送其他赠品。解犯有关法令的罚款，初犯者由二千新元罚款增至一万新元，再犯者由四千新元罚款提高至二万新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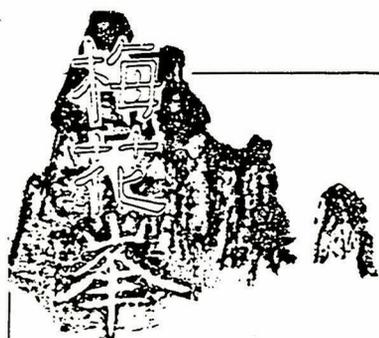
香港政府在1990年12月1日起就全面禁止香烟广告以直接形式在电子媒介中播放。这是香港1987年强制所有香烟电视广告加上“吸烟危害健康”字样后，又一项对禁烟的重大措施。

我国1970至1990年先后制定多项法令以对付吸烟者，包括在德士及巴士上禁止司机、剪票员与搭客抽烟，香烟广告也禁止在全国电台及电视台上出现。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已经立法，但仍有不少烟民无视法律，迷

你巴士司机一边驾车，一边吞云吐雾的事时有所闻，也未见他们受执法人员的严厉对付或取缔。而我国的香烟广告品牌名称，在厂商与广告商的精心策划与设计上，尽其所能，几乎无孔不入的大打其香烟品牌，这种打变相广告的方式早已被新加坡政府严厉禁止，但我国的电视媒体却让他们“大行其道”，难怪汤杯羽毛球大决赛在大马电视台现场转播时，一家香烟广告不断的打响其品牌，以此烙印在烟客脑中。

在百货公司及超级市场，动用美女点烟、送烟、又赠送礼品给现场购烟者的促销方式已在我国行之多年，如果我国政府口口声声大力禁烟，却无视香烟广告变相的促销方式，我想禁烟的努力只会成为“空中楼阁”，毕竟烟草公司有庞大的资金，他们应有绝对的把握利用广告攻势去抗衡政府一切的禁烟政策。





# 浅剖华堂选举

■刘锡通

4月间的雪华堂选举，滚滚尘埃总算已落定。这阵尘埃所带来的一些污迹，也许会深深的印烙在人们的记忆里，久久难以涤除。也许会随时日渐渐地被淡忘。等到另一次的角逐来临时重新登场。这都对华社不会有好处，因此对此次选举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不应该回避，而应以堂堂正正的态度提出来检讨，以作未来的参考与警惕。

首先，此次雪华堂选举中，雪隆工商联合会的一些董事为了支持其会长之参选，针对台湾侨务委员会捐赠给华堂的一对石狮子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字眼而大作文章，这是最不智之举。众所周知，海外华人过去百年来

都一直被牵连在中国国内党派之争，只因当时华人旅居海外在殖民地国家处处得不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他们唯有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当中国政治上出现了新旧派系之争，海外华人也身不由主的依样画葫芦。例如在清末民初之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了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到海外建立势力，海外华人也因此分裂为两派，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海外华人也同样地分为两派进行斗争。而这些斗争都一直跟随着中国社会的动荡起起伏伏。海外华人自己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是那么地被动，当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邦交

修好的时候，这些华人生活则比较好过一点，当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关系恶劣的时候，这些华人便首当其冲，受到排挤与残杀，当中国面对外侮与灾难的时候，海外华人则发动拯灾救国之运动，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这种情结不但给海外华人带来许多负累，同时他们的效忠心向也常引起当地政府之质疑。50年代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了，海外华人也开始成为当地公民，其国籍已有所改变，其效忠对象也就不同，海外华人多仍保有中华民族之血统，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中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对两岸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之分歧与争执，我们只寄



于同情而不应再插手过问，我们如果被认为有能力有分量，我们不妨效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资政一样扮演着两岸中国人协调和解的角色，如果没有能力和分量的话，我们就不如保持低调，别再去将自己卷入漩涡中累己累人。

其次，在这次华堂选举中，我们对嘉应会馆的表现也应该感到悲哀。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帮派思想幽魂之重现。出于乡亲之情谊，该会竟将原则也忘了。不久前他们将其前任会长推翻，并剥夺了他出席华堂的代表权。这次在乡亲的压力下，该会却一改初衷，投他一票，举他为华堂会长。这种一时认为他连作

代表出席华堂都不适合，一时又举他为华堂之会长之作风，实在很难向华社交代，同时也是一种开倒车之做法。

其三，最乐剧团在阔别华堂 10 年后，又在没有尽义务缴付 17 年会员费的情况下，突然被请出来投下他的“神圣”一票去决定华堂的命运，这是一件非常滑稽之事。同时也是一种良知的背叛。它的地位突然被抬举到比其他团体会员还高，对那些数 10 年默默努力做事的会员，实在是不公平之极。可是在选举过后，新任会长却对它奖励有加，说该会过去贡献良多，这次来投票出于关心和爱心，我们不晓的这是不是出于肺腑之

言，如果是的话，今后即然华堂董事都可以放心回去沉睡 10 年。同时不缴会费，等到适当的一日再出来领取会长的嘉奖了。其实这次发生的事，如果新任会长能坦坦荡荡的拒绝接受最乐剧团的那一票，而宣布重选，那将会对华社树立新作风而受人敬仰。同时有更浓的机会获得一些会员反过来投他一票。同时也省得会长过后费尽心机用种种言论来解释这张票不是由他争来的。

总之，这次雪华堂选举，上述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空前的，至于它是不是绝后，那就要看华社会不会与那种作法认同。如果说热心于服务社会是一种崇高的理想，那么要达致这理想所用的手段也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手段也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要用心术权谋来建设“服务”的目标，任何辩白说“服务社会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或是“一种无酬的付出”都会显得虚伪和无力的。



■刘锡通

# 绝症

■甄供

一位十四岁的中学生，竟然会去嫖妓！

原来他金榜题名，参加政府考试获得了七个A。于是他就与朋友狂欢庆祝，被友人怂恿去嫖，不幸染上世纪绝症——爱滋病，成为我国医学史上通过性交而染上爱滋病的最年轻的带菌者。

这项骇人听闻的事件，是谁揭露呢？曰：副卫生部长法立阿里芬。

于是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位少年在校品行兼优，成绩特出，深受父母和师长的爱戴，可惜他对性事充满好奇，一知半解，才会“撞板”。如果在中学为学子灌输正确的性知识及各种防止爱滋病传染的种种措施，那他何致如此呢？

很好，言之有理，可惜却不是防止青少年走向堕落的仙药灵丹。假设这位7A生或类似他的学生，懂得性知识，懂得防范爱滋病的措施，放榜之日，也去嫖妓庆

祝，终于“无恙归来”，我们是不是还认为他们是“深受父母和师长爱戴的好学生”呢？

不必讳言，我们社会已弥漫了文凭至上主义思想。谁考到多少个A，就意味着谁的前途无量，将来捧的是金饭碗，可以锦衣玉食，享受安逸的生活，而大多数师长和家长眼中的“品学兼优”者，着眼点就在这点上。

读书为了考试，考试为了获得成绩优良的文凭，有了这张文凭，将来“食”就不用愁眉。这是时下大多数年轻学子的理想，也是很多师长和家长所要灌输给下一代的思想。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猪栏的理想”。在这种意识“薰陶”下成长的青少年，他的精神怎不空虚和苍白，他不去嫖妓，不去为非作歹，难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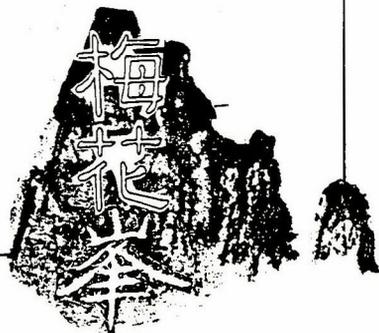
嫖妓，不是一种无意识

的行为，而是嫖者低俗思想的体现。还有，我们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变化，各种不良意识铺天盖地而来，侵蚀我们青少年的思想肌肤。如果我们不加强思想教育，提升青少年识别美丑的能力，那么，他们将会患上比爱滋病更可怕的思想的爱滋病！

(1994年5月21日，夜。)



■甄供



郑重推介



# 四两拨千斤 中小企业成功之道

你面对生产线上的难题束手无策？

你的企业三年后在同行中排行老几？

为提高业绩挖空枯肠？

与其终日惶恐，倒不如马上行动，为你的企业升级找方法。

华资中小企业辅导处郑重向您推介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CPC）出版的《战略生产力》月刊。

这本管理杂志内容丰富扎实，理论实务并重，《战略生产力》提供您：

- ①新观念及论点评析、特别企划、人物特写；
- ②技术突破；
- ③经营战略；
- ④大陆经贸动态、个案报导；
- ⑤训练走廊；
- ⑥管理锦囊、第三产业、商业小说、等等。

**欢迎企业界的朋友订阅或邮购，共同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

●出版 中国生产力中心(China Productivity Centre)

马来西亚总代理：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资)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北马代理：

温馨苑

Home Dynamic

17-C, Jalan Barrack

10450 Pulau Pinang

Tel: 604-2281890 / 7 Fax: 604-364677

南马代理：

综艺传播有限公司

T & T Variety Broadway Sdn. Bhd.

10-B, Jalan Perang,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Tel: 07-345449

農牧世界給榴槿種植人的另一呈獻

# 一本書的代價

等於 RM130 榴槿講座會

①林文忠推荐：

## 檳城的榴槿品種

從檳城榴槿比賽六屆冠軍——葫蘆、紅蝦、15號、坤寶紅肉、紅仁、D600到金魚、貓王、頭家……將近三十個品種，圖文並茂，單看圖片已能嗅到浮羅山背的榴槿飄香。

②楊華勇教招：

## 榴槿真菌病的防治

榴槿難種，真菌更難防治，腐幹病、凋萎病、絲狀枯萎病、白根病、白疹葉病……對症下藥，消滅真菌，讓病樹恢復蓬勃生機，小園主不必再頭痛！

③黎德泰分析：

## 大馬的榴槿栽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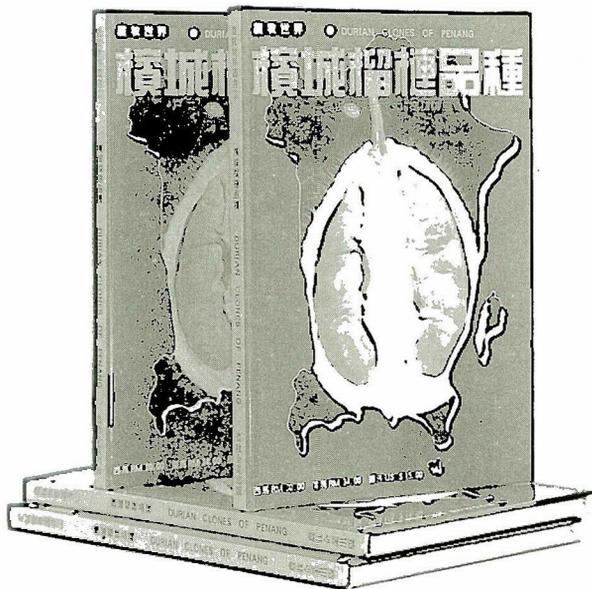
先種種子再駁接，榴槿容易長大？直接栽種駁種樹苗，快速開花結果？兩種栽種法，孰優孰劣？一個園坵只栽種一個品種，滿園的榴槿不開花？……連串疑問，盡有答案！

④藍進喜介紹：

## 榴槿病虫害的處理

菌病難發現，害虫看得到，撲滅害虫是小兒科？但是，為什麼滿樹的榴槿，有一半賣不到錢？都是蛀果虫造的孽，掌握噴藥、噴煙、裝置榴槿燈的方法，殺盡飛蛾，粒粒榴槿沒有虫洞。……

隨時翻閱，  
永久保存！



發書有限，欲購從速  
各大書局報攤均有出售

●郵購詳情，請聯絡農牧企業 03-2380740 / 03-2302523。



# 政治科学的核心

## 是真抑或善？

### 对有关当代政治科学之评论的一点反思

■祝家华

#### 前言：政治科学的困境

对于政治问题的探讨，历史无疑是久远的，两千年前柏拉图和阿里斯多德等人讨论的正义和民主的课题。孔子和其门人探究的德治和仁政等问题，至今从未中断，且大有日久弥新的趋势；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所谓“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研究，却是年轻的，加上当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典范（Paradigms）不断转换，其知识的专业经常受质疑，因此在1976年的有关本身专业研究之评估的调查中，美国的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中只有廿四巴仙表示会重新选择政治科学作为他们的学术专业，显示了当前政治科学界对其政治研究有巨大的不满。

不仅如此，有关政治科学之应否有核心或该有什么样的核心之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也一直没有解决，政治科学界显然对此重要问题没有共识，甚至大有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情况。Almond就曾在1988年写了一篇有关当前政治科学界的学派林立的情形，他将这些学派划分为四个主流派别，即强硬右派（Hard-Right）、温和右派（Soft-Right）、强硬左派（Hard-Left）和温和左派（Soft-Left），其中尚有不同的派别，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们都有自己有关政治科学之研究方法（Methodology）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之立场，David M. Ricci乃被归类为温和左

派。

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 Somit 的看法最能说明政治科学的当前困境。他说：“政治科学远远落后于经济学。至少在分析的目的上，经济学家已经同意“经济人”的动机驱使和心理属性之特点……他们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发展出最吸引人及严格的理论体系。但是，政治科学家还无法在“政治人”的理解上达致一个共同的想法。许多政治哲学都是一也将继续是在争论下列基本的问题：人是性“善”或性“恶”？人基本上是自私的或利他的？人的统治管理之能力基本上是平等或不平等的？”。然而，这问题恐怕短期内不会有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要如何看待政治科学？我们应怎样要求政治科学？这是务必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 （一）政治科学作为“科学”： 真像的探讨

拉丁的谚语“Veritas Vos Liberabit”即“真像将使你获得自由”，道出了近代科学掀起之内在的动力。“科学”是指以固定重复的方法来研究可取得固定的事项，因此“科学”是获得知识的有效手段。人类以“科学”的研究手段有效地解决物质乃至控制大部分的自然环境，大大地改善和提升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变迁使到人



类以为“自然”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在人类社会本身的研究，以获得有关人类本身的真像和知识，以使人类不仅从物质的束缚中争取解放，同时在精神领域中获得自由。于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乃至各种人文的“科学”竞相出现，以为只要冠之于“科学”，有关学科的知识就获得确定性和权威性。“政治科学”就是近代“科学庙宇”（Temple of Science）中的一支旁枝。

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政治科学界企图以追求自然科学的知识之方法和精神来探讨政治问题，在方法上要求实证的研究，讲求资料的丰富、准确和统计上的精密；在研究态度则要求所谓的科学之超然精神，不仅希望政治研究者在价值上保持中立，不介入的态度，更进一步在言语的应用上避免所谓有价值偏见的字眼，如正义（Justice），权利（Right），爱国（Patriotic），道德（Virtue）及专制（Tyranny）等，取代的新字汇如游戏（Game），互动（Interaction），学习（Cognit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及系统（System）等。这群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旗帜的美国政治科学家，试图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和“超然”的态度来探求人类的政治事务，期望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一如获得自然事物的知识。

但是，依据 Ricci 在《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里头的分析，美国的这群政治科学家并非完全价值上超然，他们是追求崇尚民主的价值，因此实际上他们不断在这三个点上移转——即确定某些政治事务值得研究，然后要求“科学”地从事研究工作，最后达到终极的民主目标——但是，他们发现所研究出来的成果无助于民主的推动或和民主的原先之设想有差距，因此又回到第一个点上，重新开始寻求另一些值得研究的政治事务。美国政治学界的所谓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Behaviorism & Post-Behaviorism）之典范的转移正是上述情况的写照，所以 Ricci 指出在本世纪

中，这样的转换已经超过一轮了。

明显的，当代政治科学经过了近百年的努力，并没有建立起有关政治事务的确定性之知识，政治科学的“科学性”，乃不断受到质疑，其研究典范的快速转换，正说明了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的不稳定性。就如前所言，政治科学的核心和应有怎样的核心并没有共识，有关政治知识的“真理”并没有发现，人类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提升，真正的民主也没有落实。Ricci 指出，政治科学这门学科的集体欠缺是它固执地坚持“科学”地研究政治事务（the discipline's collective shortcoming is located in a stubborn insistence on studying politics scientifically）。

这说明了什么呢？笔者以为，政治科学不能仅仅是一门“科学”；我们几乎很难获得政治事务真正的真像，因为政治事务不如自然事物那样固定不变，它时时刻刻因人的行动和实践而有所改变，甚至我们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它会影响到用来支持/反对某些事务。因此，政治科学在方法上可以是“科学”，但不能只是“科学”的，它可以是批判的；而在态度上几乎不可能完全是“超然”的，因此政治科学的实践性必须强调——也就是立场是必要的。

## （二）政治科学的“实践”： 批判的要求

为什么要强调政治科学的“实践”性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研究人类活动的一门学科，政治科学就无法脱离它也是人类理论活动的一部分——理论活动是实践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科学是人类自我诠释，自我理解的实践活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诠释、自我理解的“知识”“理论”并不完全足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人类获得如何多的知识，她并不能阻止邪恶的发生。“在人类的事务上，没有节



制的情感而不是不足够的资讯造成我们社会的最大难题。”换句话说，知识不能代替智慧，政治生活乃至于人类的整体之生活的改善，固然需要知识的累积，但那只是必要的条件，充分条件必须靠智慧和勇气。

Morgenthau 因此指出，那些头脑“科学性”的政治学者天真的以为“是由于（人）缺乏理性而使邪恶降临世界”。实际上，是因为“贪污和罪恶”（Corruption and Sin）继续污染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而战争作为人类邪恶中的最大者，其最难以消灭是因为它发动自人类最深沉的灵魂之欲望。”要如何去面对这些人类和邪恶呢？只是“科学”地研究和分析是不足够，我们更需要有勇气和智慧去批判这些邪恶的政治事务，并毫不犹豫地指出人类社会应寻求的社会方向。这种批判的要求，使到政治科学之研究必须有其立场，这样实践性才能展现出来。没有立场的政治研究是不可能具有实践性的，就好比核子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它本身没有实践的可能，它是被决定的——被有权力者所决定，如果政治科学变成纯粹的自然科学，其命运和核子的研究是一样，它可以随意被扭曲，抹杀或利用。

非常明显的，作为研究人类本身的活动之学科的政治科学，它不能逃避其实践性的强调，其批判性才是它的生命力，没有它，政治科学几乎和其他的自然科学没有差别。因此 Ricci 指出，虽然在日益专业化的知识领域中，似乎没有任何领域的知识可有资格跨越领域为整体的社会前景发言，而且大部分新的学科也乐于避开这个责任，但是对于政治科学来说，它是很难逃避为社会最终的目标提出规划的责任的。

然而，当前的政治科学并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许多的理想和投诉指出，政治科学并没有结论式地提出导向良好社会的路途，而它的教学也没有整合起来以突出某些重要的课题，以使人们注意”。尤有

进者，“政治科学家发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他们不知道该集体采取何种立场。”

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它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它又放弃其“实践”的批判要求，政治科学会变成怎样的一门科学？是否真的如 Ricci 所说的 Tragedy？如果我们还是只追求“真”（像），而不追问“善”如何可能，政治科学或许真的变成 Ricci 眼中的《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届时，政治科学无法找到如自然科学的“真理”，连有关“道理”之探讨的“战场”也将失去，那么政治科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令人怀疑的。

## 结语：人的主体性与 真善的互动

当代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Sociobiologist）Edward O. Wilson 曾表示：“纯粹的知识是最终的解放者。它使人人平等，并可治理邦国，它粉碎了古代迷信的障碍，并为提升文化演化的途径许下诺言。但是，我不相信它可以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或将可预测的历史路径之主要方向加以扭转”。这句话为希腊的谚语“真像使人类获得自由”作了诠释，然而真像和知识无法改变人类的行为，因此“真像使人获得自由”虽然是对的，但只是对了一半，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人的主体性之发现——只有当人醒悟到人是他自己的主人时，知识才可望转成智慧，这时真正的自由才可望出现，人的主体性之创造也可能带来行为的改变，人类历史途径或有转变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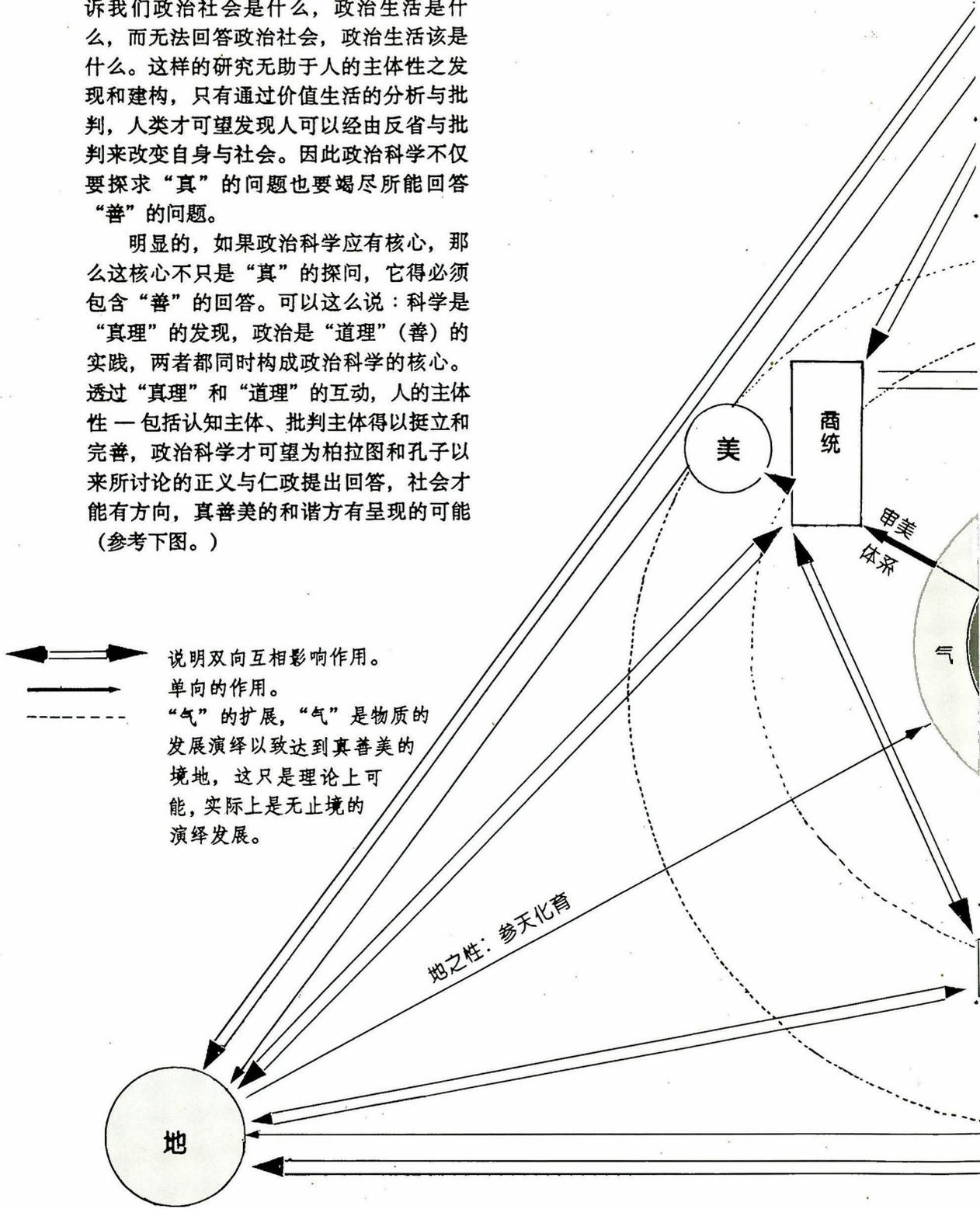
当前的政治科学之探讨与研究是否有助于人的主体性之发现？Ricci 在《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就曾提到类似的政治科学之难题：如果政治科学家只是一名“科学家”（Scientist），那么他是否可能对人类应做什么和该要什么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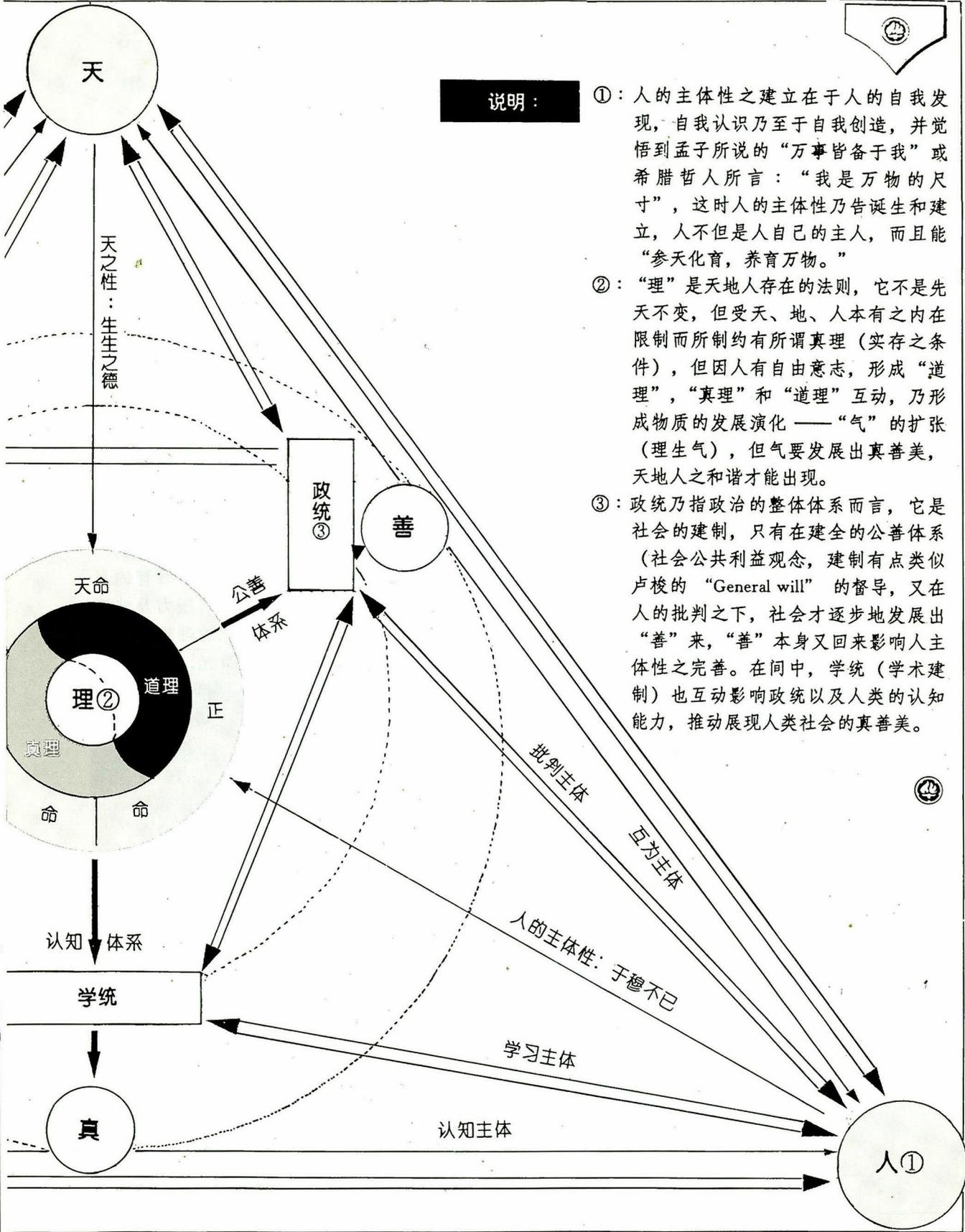


权威性的说明？显然的，假设政治科学只是科学地研究与探讨真相，那么它只能告诉我们政治社会是什么，政治生活是什么，而无法回答政治社会，政治生活该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无助于人的主体性之发现和建构，只有通过价值生活的分析与批判，人类才可望发现人可以经由反省与批判来改变自身与社会。因此政治科学不仅要探求“真”的问题也要竭尽所能回答“善”的问题。

明显的，如果政治科学应有核心，那么这核心不只是“真”的探问，它得必须包含“善”的回答。可以这么说：科学是“真理”的发现，政治是“道理”（善）的实践，两者都同时构成政治科学的核心。透过“真理”和“道理”的互动，人的主体性——包括认知主体、批判主体得以挺立和完善，政治科学才可望为柏拉图和孔子以来所讨论的正义与仁政提出回答，社会才能有方向，真善美的和谐方有呈现的可能（参考下图。）

图：天地人之关系以及政统和学统之互动性





说明：

- ①：人的主体性之建立在于人的自我发现，自我认识乃至自我创造，并觉悟到孟子所说的“万事皆备于我”或希腊哲人所言：“我是万物的尺寸”，这时人的主体性乃告诞生和建立，人不但是人自己的主人，而且能“参天化育，养育万物。”
- ②：“理”是天地人存在的法则，它不是先天不变，但受天、地、人本有之内在限制而所制约有所谓真理（实存之条件），但因人有自由意志，形成“道理”，“真理”和“道理”互动，乃形成物质的发展演化——“气”的扩张（理生气），但气要发展出真善美，天地人之和谐才能出现。
- ③：政统乃指政治的整体体系而言，它是社会的建制，只有在建全的公善体系（社会公共利益观念，建制有点类似卢梭的“General will”的督导，又在人的批判之下，社会才逐步地发展出“善”来，“善”本身又回来影响人主体性之完善。在间中，学统（学术建制）也互动影响政统以及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展现人类社会的真善美。





# 美学教育的改革精神

## 略谈蔡元培对女子与

■蔡玫姿

### 前言

我对蔡元培先生的认识，基本上极为浅薄的。中学时代除了读过基本教材中一两篇关于他研究美学的心得，以及时人纪念他的文字。我特别对课堂上，老师环顾四周，对坐满凝神听讲的女生，发出感叹印象深刻。她说：“今日你们这些幸福的女孩，包括我在内，能够‘理所当然’的来上课，蔡氏功劳不可泯灭。”处在今日两性关系渐趋平等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想像在那个裹小脚、充满陈腐气味的社会里，蔡元培先生是如何具有那么“前卫”、公正清明的眼光？能够首开“爱国女学”，又在北大首度招收女生？而他在战乱频仍，新旧交替的环境里，为了贯彻教育的真谛，毅然面对各方面强横的压力及波涛汹涌的舆论，并坚持改革的理想。这种开阔的胸襟，前瞻性的眼光，以及作育英才的抱负真是令人惊讶与敬仰！

蔡先生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具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崇高意义。就我而言，以一个大学女生的角度，来谈对蔡先生的看法，我想是具有深刻的意含。这一半是因为我深受其遗泽，得以跨入大学殿堂，和异性同受春风化雨，另一半则是因对其美学信仰的肯定，和美育贯串生活的赞同。所以，以下我就试以这两方面，分别论述我对蔡先生的看法。

### 学人、通人、教育人

蔡元培先生的人格涵养，由其生前好友吴稚晖先生的评价中可以窥知一二。吴先生赞扬他不仅为一个学人，而且是“学人兼通人”。因为具有专门学



问的学人，在当时五四精英中，为数并不少。但能博贯中西，融会一身，并大刀阔斧，开通风气的通人就不多了。蔡元培先生，很难得就是一个兼具二者，而且终其一生在思想和信仰上，永远站在中国社会尖端的人物。当我们论述美学时，蔡先生是这方面的巨擘，而当我们言及信仰思想时，他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通才。故而在民国6年到16年间，蔡元培先生治理北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深刻的突破，是至今鲜有他人所能比拟的。

罗家伦先生曾对蔡元培先生治校的兼容并蓄深表赞同。他说：“先生是一个中国学问很深，民族意识极强，于中年后再度欧洲留学多年的人，所以他对于中西文化，采取融会贯通的态度。他虽提倡新的科学研究，但当时他为北京大学集合的国学大师，实极一时之盛。他对双方文化的内涵，是主张首先经过选择而后加以保留或吸收。”罗家伦先生在此除了提到蔡元培先生好学不倦，吸收新知不惮年长的态度。同时也看到蔡先生治校的包容心。在当时北大教授的阵营中，蔡先生以“学术”内涵考量人才。因此延揽到的教授，或许意识思想各有所据，比方顽固派的辜鸿铭，刘申叔，后来倾共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首脑胡适，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但因为他们在学术涵养上各有独到专精的一面。故蔡元培先生都以“学术自由”的态度包容他们，使北大在其主持下成了一座新旧学术思想的熔炉。民国4年到10年间，他甚至聘请到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杜威来北大讲学，藉以陶养学生世界观的修养。像这种气度和眼光即使在今日仍是相当宏伟和不易的。

至于今日在台湾喧腾一时的“教授治校”理念，在当时北大蔡元培时期已获短暂实践。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以后，就组织一个教授聘任委员会，以决定教授延聘问题。新教授的任用，是要经过严格的委员会审查与投票决定。这种治校的公正持平，使得大学不至于成为官僚式的机构，甚至政治、学术混为一谈。这对于台湾当前大学校长，行政人员的“空降”任用制度，可说是具有良好典范及借镜。

当然关于蔡先生的教育理念，最引人津津乐道和开通风气的，该是民国九年北大开始招收女生的制度。蔡先生说：“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从前教育部的大学法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以往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当时女子教育程度不高，而且社会风气保守，有极少专门的女子大学招收女生。但是像蔡先生这样明理透彻的人，从早年参与爱国女校，就抱持著社会改革，须由扩张女权，平衡两性关系开始，甚至到后来打破社会男女有别的传统，不顾时势批评和教育部弹劾，力主男女同校，采用同质同等的教育品质。实在是留给中国妇女莫大的纪念。这是蔡先生由孔子“有教无类”的观念出发，扩充到极至的表现。他在北大最初几年，创立“校役夜班”让想上课进修的工友夜间听课，白天工作。还有利用“平民夜校”以普及知识的大众化、民主化，都是因深解教育濡化作用的先见所致。

## 进德·美育

蔡元培先生对于学生的身教言教也



是极为特别的。当他初到北大时，就感于校园风气的颓靡，遂提出“进德会”的构想。一方面定出不嫖、不赌、不娶妾等针对古老陋习所做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因眼见民国六年、八年歪邪的北京政风，定出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的规定。再加上养身以养性的必要，增定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肉的条例。而由他自身发起，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风气，使得北大的学生从古老不合理的习气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不作官”的戒条，使学术自由与政治官僚独立分家，同时配合时势将当时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社会基础铲除。因此，他以居北大校长之尊，除了在学术界引领风气，马首是瞻外，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改造，更具有间接影响的实际功效。

从其“怎样配称做现代学生”一文（民国十九年十月）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对“现代”学生的期许（节录）：

“我以为至少要具备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自爱爱人的美德，才配言现代学生而无愧。”

这几个对学生的期许条件，陈述的相当生动妥切。特别是在美育的贯输教养上。蔡元培先生本著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所受的美学，心理学教育。力倡

“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这个观念一方面又与他的宗教观结合，形成一种极为理智又不过于偏颇的态度。因此，他对于宗教仪式、信条可以涵养德性的看法抱持著怀疑精神。而以为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若采以美术“超越性”的心理，便能发展为“置一身利害于度外”的高贵情操。倘再兼以美的“普遍性”，则基于“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的反应，将会因不忍见他人哀痛而不施恶行。因此，蔡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神州学会都曾演讲阐述他的“美育替代宗教”说。冀望能以美学感染力造化人心，达到一个合宜和平的理想世界。

蔡先生之说正是想以美学感染众人之善，扩大众人闭塞的胸怀。他常说美术的批评具有“相对性”，若能洞悉美学世界里价值的绝对，永恒的美好世界就容易掌握。这是他除了发展艺术范畴、哲学思维里美学的价值外，又考虑到美的心态引用到现世的功效。民国元年十一月，武进刘海粟设立上海图书美术学院时，曾发表一份宣言：

“我们要在惨酷无情、乾枯堕落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把固有的精



神恢复。”

蔡元培先生则在“25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引证此段话，同时说明他自民国元年引进德文 *Asthetische Erziehung*，译为“美育”一词的目的。文中表现他关照民国25年来，社会上对美学教育，陶冶性情的努力，可以得知他对美学世界的倾赖和迫切欲使教育美化人心的愿望。这个崇高理念在当时时尚纷乱下虽然功效并未昭显，但却为今日蓬勃的艺术生态洒下开端的种子。而在今日泛宗教化的社会行为中，蔡元培先生的深刻美学心理，是否有进一步提倡提升的必要？我想这值得教育当局深思。

## 结论

综观蔡元培先生一生，学养贯通中西，又能自创新见，心胸兼容众说，却又和而不同。他提出的改良教育五大方针：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均影响至今而与我们的德、智、体、群、美五育结合。至于他借用教育力量改造社会风气，甚至政治传统积习的功效更是显著不可磨灭。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不幸撒手长逝，弥留之际仍对“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感到憾恨。他留下“美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遗言，希望能从美化人心、强健国体做起，彻底在教化、自强的过程中改变中国的命运。而他的流风遗泽，不仅树立学术自由风气，更影响台大傅斯年校长努力承办治校的精神，使迄今台大仍以自由的学风为著，成为莘莘学子向往的目标。蔡元培先生对台湾的教育界可说是具有衔接的带头作用。而其建立众多的良好典范更是今日各大学普遍依循的方向。



# 好书！ 介绍给您

骆静山论文集

『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

出版了

骆静山先生论知识分子，见解精辟，新人耳目。他的《知识分子论》在报上发表，论点深受舆论界重视，不断引用。四年后，报章还循读者要求，而将全文重刊。

骆静山先生论社会文化，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又广泛涉猎了西方的现代学说，评议立论，含有鲜明的时代使命感。

《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内容丰富，可读性高，富有启迪意义

《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  
每册 RM12.00

欢迎购买，请联络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请即订阅

# 教育天地

双月刊

## 掌握

## 《教育天地》

## 资讯：

## 管教孩子， 指导学生， 得心应手。

- ▲在教学上遇到困难，有什么有效的教学方法？
- ▲学生的行为很糟糕，他们需要哪些有用的辅导？
- ▲语文这么难掌握么？如何教好语文科？
- ▲教学生活中有哪些趣闻，您知道么？
- ▲孩子的叛逆行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为什么孩子会面对学习的困难与障碍？

<<教育天地>>双月刊的内容丰富，包括了生活辅导、心理教育、行政管理、校园文艺及教学艺术等的文章，使您在知识浩瀚的学海中，尽量撷取您所要的资讯。

- 订阅《教育天地》
- 一年（6期）     二年（12期）
- 新订     续订（订阅编号：\_\_\_\_\_）
- 附上划线支票 / 汇票 / Wang Pos
- 列号 \_\_\_\_\_ 款额：\_\_\_\_\_ 请查收。

订阅价格	一年（6期）	二年（12期）
马来西亚	RM15	RM30
新加坡	S\$25	S\$50

由199\_\_\_\_年\_\_\_\_月起至199\_\_\_\_年\_\_\_\_月止共\_\_\_\_期。

收款人：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服务机构： \_\_\_\_\_

地址： \_\_\_\_\_

邮区号码： \_\_\_\_\_ 电话： \_\_\_\_\_

订阅热线：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321-D, Lrg. T. A. R. Kanan Satu,  
 Off Jln. Tuanku Abdul Rahman,  
 50300 Kuala Lumpur.  
 Tel: 03-2985759, 2912372  
 Fax: 2927948

日期： \_\_\_\_\_ 签名/盖章： \_\_\_\_\_

△请勿寄现款。外坡支票须附上银行手续费 RM0.50。





光

一样的人

史

一样的历史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 辛金顺



● 蔡元培先生

在整个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大学可说是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北京大学已经成了中国最高和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殿堂，它是当时学术的重镇，新文化与新思想的摇篮，启蒙运动的主导中心。而北大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锋，这就要归功于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其任职其间所提倡的一连串改革，使北大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因此，当我们称誉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时，则蔡元培就是那双推动摇篮的手。他的地位及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他也是影响中国教育最深远的一个教育改革家。北大在他的主持下，成了新旧学术和中西文化的熔炉。所以陈顾远曾经在一篇〈蔡校长对北大的改革与影响〉中说：“只有在蔡先生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才配称为大学，同时，也只有蔡先生一人配称‘大学校长’”。



本文将简略叙述蔡元培的行谊思想，进而探叙其对大学教育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北大的内部组织、学风的整顿，及其在五四期间的间接表现与影响。

## 蔡元培的思想行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表现着改革者、教育家的风范，循着思想自由原则，以兼容并蓄的主张，为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倡导新风气。尤其在北大校长任内的连串改革行动中，影响所及，造成五四爆发的一个关键，因此，这样一位关键人物，其行为成因并非单纯，而必是会经过长时间的转折，酝酿而逐渐形成。依照蔡元培幼年的资料显示，他早已表现出对其未来成就与人格的影响。这种倾向再经历各种内外因素的交相冲击，引致他那开阔的胸襟与高度的改革精神，这份性格则也关系到后来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影响了。

蔡元培生于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一商人之家，自小沉浸于经典之中，20岁前特崇宋儒，讲孝道，并重视伦理与儒家古文道德内涵。他在26岁点翰林，31岁任翰林编修。在此之前，他对旧有制度仍存有信心，唯对清廷的腐败与外交的无能却难掩其愤慨之情。因此在其任翰林编修时即渐渐暗中支持康有为的改革，直到变法失败，保守的旧势力重掌大权，至此蔡元培终于感到清廷前途的无望了。遂毅然弃职返故里从事新式教育，期望从根本的温和改革中求国家进步的基础。蔡氏先后任教于绍兴中西学堂、二载书院、南洋公学、女

子公学、办开元报并成立“中国教育会”等。窥其所作，均是属于较温和性、教育性和基础性的革命事业。

蔡元培的思想无疑是受到斯宾塞及赫胥黎西学的影响，而扬种进化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双重冲击使他不仅对儒家的制度产生怀疑，而且激发了他成为一名更积极的改革份子。他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任光复会会长、预埋暴动及暗杀种子等，俨然已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人物，但与其少数的革命同辈比较，与其说他是个革命人物不如说他是个极负盛名的教育家。因此后来蔡元培在革命所图不遂其志后，而真正体会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希望是在教育的培养和思想的改革，那才是最基础的革命工作。所以他乃决定赴欧游学，亲身一探西方文明的源头，并期望从中寻求一份思想上的提升和自我的充实，认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做准备。是故，若说上海时期蔡元培的行为是属于革命家与教育家的，则他赴欧后所表现的一切，足见蔡氏是极有高瞻远瞩，胸怀宏识的教育改革家，这可从他在掌权北大时所进行的一连串改革中而见一斑。

在1907年抵欧后，经由吴敬恒与李煜瀛等人的影响，使蔡氏最初接触到克鲁包持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主义，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具人文持质的学说迅速获得蔡元培的垂青，虽然蔡元培本身并非完全同意此一学说，但在其方面而言，此一学说却是蔡氏在往后思想上的一个衍伸基础。在德国来比锡大学时，蔡元培的主要兴趣是表现在文史哲方面，尤其是实验心理学与美学，并进入世界文明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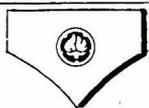
段期间，蔡元培涉猎了当代德国哲学家之哲学思想，并融合衍生出属于他自己那更广泛的世界人文主义观。至于对他所涵具的大学观念，无疑是受到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hile Van Hambolct）的影响。和冯波德一样，蔡氏在他主持北大期间，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笃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因此，在校时，他就是根据着这种理由，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的派系存在，他一直认为，只有学说上的宗师，而不能有门户的领袖。实际上，北京大学在当时就涵蓄着各种不同思想、派别、年龄、资格和党籍的教职员，如有帝制派的刘师培、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国民党的王宠惠、主复辟的辜鸿铭、自由主义的胡适之和李煜瀛、信古派的陈汉章及疑古派的沈尹默等；论资格有旧时代的进士、新时代的博士，也有新旧任何学历都没有的人如梁漱溟等。蔡元培就是这么认为，唯有“泱泱大风”和“休休有容”才是一间大学应有的气度。

北大校长的任职，是蔡元培生命中最大的转捩点，它使蔡元培得以宣示自己的理念，这与他在当教育总长时所面对的压力和限制是颇为迥异，这源于新思潮的逐渐萌芽，使得他的教育改革开始受到知识份子的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来自政府中保守势力的阻力也渐松弛之故，使到他五点教育的理念重获生机。而蔡氏在北大的一番改革更成了民初大学教育的转捩点，也直接对五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赵家壁在〈忆蔡元培先生〉说：“蔡元培先生对中国

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计的……没有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也许要迟来几十年。”这话虽有点夸张，但也肯定了蔡氏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 大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蔡元培向来是主张“研究学术”，以做为大学的最大任务。因此他大事鼓励教职员和学生自由研究，以期由学术的研究促进学术的进步，他在大学会中就曾订定“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致词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之宗旨，欲知宗旨之大与否，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说“所课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上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并不是硬记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虽然蔡元培主张大学是以“研究学术”为宗旨，但他认为“学”与“术”是有所区别的，大学的研究是以“学”为范围，即培养学问家，而“术”则是专门学校研究的范围，那就是培养出专业的职业人材。因尔他曾主张将“学”的文理各科，与工、商、医、农、法的“术”截然分开，并重“学”而轻“术”，在这方面的主张，显见蔡元培人文精神的抱负和理想，肯定“学”在人格的培养上和文化的提升是极其重要



的，而不把大学当着专门制造职业的工厂，这是许多人所不能及的远见。

关于教育的本质理念，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那些被教育的人，让他们能够由此发展自己的潜力，完成自己健全的人格，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尽一份责任。同时他也大力主张教育的独立性，意即教育不应受到任何宗教或政治的影响而成为一种工具，以致受教育的人成为器具，而被某些具有目的者或野心家所利用。所以蔡氏提出教育完全脱离政党及政治而独立，但实际上教育脱离政治而独立在实践上是颇为困难的。何况就理论上而言，倘若政治与教育完全自我独立，则政治的理念如何推行？教育的宣扬如何运作？况且蔡氏本身也是寓政治于教育，以政治为目的，以教育为手段。当康梁的变法失败时，蔡元培就认为是因不知培养人材及教育水准低落所致，因此他才从革命的行动转到了教育的事业去，以期由教育改革中国腐败的风气，为中国注入新气息、新生命。至于对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方面，蔡氏坚决反对在大学设立神学科，他曾说：“我尤为反对那些教会的青年，用种种暗示，来引诱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基督教”，只于哲学科中设置宗教史，以做为学术的研究。基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理念能够实际的在北大施行，终使那原是承袭着官场般腐败的北京大学，面目一新，而成了一所学风鼎盛的学术机构，学生也非以往那般只求一纸文凭谋求一己功利的投机份子。相反的，在如此开明的学风下，学生欣然接受新的人文理念和思想，并养成独立思考与行为的能力。学生的气质完全改变，并开

始努力去关怀国家时事，重拾社会的使命感。这时期，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文化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不止埋下五四运动的种子，也对中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及政治思想的演化形成极大的影响面。

## 北大内部组织的改革

其实，在1916年冬，蔡元培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电促其回国主持北大时，许多朋友都一致认为北大太腐败，进去若整顿不好将有碍于声名相劝，但蔡氏认为北大官僚氛围强烈又腐败，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只要尽心而已，何况他自己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当官，因此毅然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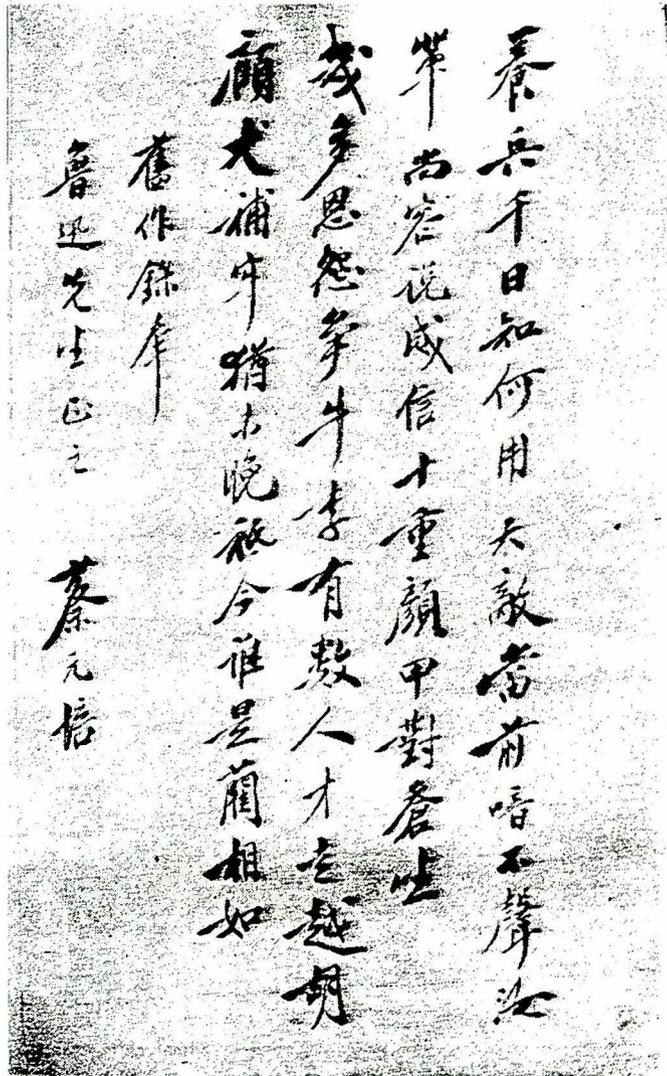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个措施，即是将无法与表现懒散、无学识的教职员淘汰掉，即使面对外国的教员，他也按照合同辞退了不少人，这使到其中一名法国教员欲控告蔡氏，而另一位英国教员亦邀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士来加以求情央说，都不因此为其等所屈或所动，这可见蔡氏温柔敦厚外表下所隐藏的刚毅性格，另一方面，蔡元培明了，要办好一所大学，良师是不可或缺的，故其延揽了一些有志气有才识的学者做教授，并鼓励教员做学术研究。至于对教员，他也只问学诣而不过问其校外的行动。这可从他复林琴南书可见一般：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行动，悉听尊便，本校从不顾问，亦不能代负责。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

斥也；本校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此指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请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按指刘师培）教员中有喜做艳词，以纳妾挟妓为能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也。”蔡氏这种泱泱大容的态度，理性而客观，不似梁任公著《清代学术概论》那般断言：“俞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微也。”论学术而涉及个人的行为，则就未免混为一谈了。

当时，北大的革新是始自於文科，故对文科学长的选任是非常重要的。他原先是属意鼓吹文学革新，身具中西学养的胡适之，惟胡适之留美未归，乃因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介而改聘陈独秀担任文学院院长职。陈独秀任院长后，即在蔡氏的鼓励下着手革新文科，并与北大的旧教员如沈尹默、沈兼士及钱玄同开启革新之端，俟胡适之受延至北大任教和后来的刘半农、周岂明等来校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后，文学革命思想也在此时大气流通起来。

在蔡元培掌政北大期间，因其兼容并包的大度胸襟，各种学说，只要言之有理，自成体系的，他都任由其之发展讲授，当时北大因蔡氏学术与思想的自由理念，而成了一所人才济济一堂的学术重镇。蔡尚思在《蔡元培先生的各种特点》一文中就指出：“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对教职员方面，纯抱人才主



●蔡元培先生手迹

义，只问学问能力，不问资格年龄，从复辟党到共产党都可以容纳；从国学到西学都要注重。”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公认，没有蔡元培，北京大学不会如此伟大，没有伟大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文化就不会如此可观了。



此外，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施了“教授自治”的制度，这与之前由校长及学监主任等少数人办理校务有很大的差别，他组织评议会和教授会，给多数教授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并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上的事。另一方面，也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主任分任教务。会议制的设立，使得学校内部组织的完备，而使得校内的政策顺达流通，学术研究也不会因更换校长而有所妨碍。这种民主式的教授治校制，独开风气，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项创举。对这制度的效实，顾孟馀有很好的讲述：“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进行者，则因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制度之结果。”

蔡氏素认办大学要以学术为唯一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大学既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则应在其上设有研究所，以作更进一步的钻研，所以清末学制即在大学之上就设有通儒院。而在蔡元培当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倡在各大学院成立各自的研究所，并仿德国的大学制，规定大学院中的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发现或创立新的原理后，再经评议会承认合格，始能毕业并予以学位，唯在当时，此一建议并未受到各大学遵行，迨至蔡氏亲自主持北大时，才在1918年成立研究所，这也是全中国第一次创立研究所的大学。在蔡元培大力提倡学术研究的风气之下，故尔打破当时许多北大学生读书只为求取文凭的心态，也逐渐洗脱大学生那种做官致富的观念。北大的读书风气大大提高，学术风气也由之

而大盛。

## 学术风气的整顿和提升

在蔡元培未掌校前的北大，是一所腐朽不堪的学府，学生终日埋首于教授那残缺不全的讲义中，苦记应试的资料，浑然不知读书所求为何事，学问的精义为何在，一昧梦想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迂志，急功近利，为谋取官职而进学，而另一类知识份子也四处奔走，寻求出国镀金之法，以期归国后直踏官梯，青云而上。因此，在蔡元培到任时，即以改革此一观念为第一要务。在北大无数的演讲中，他反复告诉学生不应“仍抱有科举时代的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史之机关”、“大学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及“发动大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社会服务之习惯。”在顾颉刚悼蔡元培时，曾引用蔡氏的言论：“昔范仲淹为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呢？”蔡元培努力的去唤醒沉睡在古老读书人求功名规式的北大学生，赋予他们新的空气，新的启示和新的灵魂，并培养他们对社会应有的当担和责任感。为此蔡元培认为现代的大学生生理应要有（一）狮子样的体力、（二）猴子样的灵敏、（三）骆驼样的精神，以及美学的修养，这样才能爱己爱人，并打破过往读书人积弱的性格和多愁的心态，以积极的人生观，去树立新风气，养成健全的人格，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革旧有落后的中国，建立一个兴盛的新中国。



蔡氏为了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及自信心，并扫除北大过往那种冷漠而腐败的气氛、改造学生那种死记硬背的读书习惯，进而培养他们学习和独立的精神，特鼓励学生成立各种会社的组织外，也推动印刷品的刊行以流通学术资讯，这是北大自成立二十年来所没有的事，民国六年刊行的北大日刊和后来的北大月刊提供师生发表一些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这无疑给学生一份自我挑战的机会，并打破形成已久的那份抱残守缺底读书态度，也使一些教师能够祛除偏见，师生共有知识的交流点，而不致彼此隔阂无知。

其中两本著名的杂志刊物《新青年》和《新潮》，对北大学生影响钜深。《新青年》是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后来陈独秀上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仍任此一杂志主编，它在文学的改革思潮和推介西方思想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及钱玄同等努力酿成一个有理想抱负的现代知识份子，以变化其他的国民，并建立一个更具创造力和活力的社会，唯《新青年》因为陈独秀走入左倾的活动而成了共产党的机关报了。至于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罗家伦等人所创办的《新潮》杂志（Renaissance）在1919年1月出版，它强调三个原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和语言的改革。并主张社会的改革，以民主代替军阀的独裁。只是《新潮》只能够支持三年二个月，在傅斯年、赵英伦及罗家伦赴美深造后，由周树人苦撑不久后即而停刊。但这两本受到蔡氏支持的杂志，对开发

北大的新风气，埋下革命与五四运动爱国和新文化的种子，是功不可没的。

但在某方面而言，蔡元培是坚守校纪不肯通融的。蒋梦麟在〈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中有这样的事件描述：“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等来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但无论如何，在北大学生的心目中，除了蔡元培，没有一人够得上做他们的校长，所以，纵然蔡氏不在北方，不在国内，也要他挂一个名，这是自有大学校长以来所未见的。这固然是因为蔡氏视北京大学的学生如同子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那冲和谦让及虚怀若谷的性格所成，诚如其夫人尝语：“蔡先生这个人，硬饭也吃得，烂饭也吃得。”因其亲和，使得人人敬重，吴稚晖誉之为通人与学人，而后世则称其为完人。纵窥其事略行迹，确非过誉。

## 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和影响

综因蔡元培的努力整顿，尤其在其人格的感召下，及一连串的改革影响，使北大的学生感知社会的责任和政治的关怀，国势的积弱和袁世凯在1915年接受日本21条要求，使学生产生国耻感，并萌生爱国的感情。当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暴发，学生很快的投入这场运动之中，北大学生表现着一份慷慨激昂、悲壮热烈的情



●蔡元培(左)与吴稚晖合影。

绪加以游行、纵火曹宅，後被捕释等一连串风波。这原本纯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运动，被投机份子所渲染扩大，尤其亲日派方面，认为此事全由北大主持，必也是出自蔡元培的唆使，遂矢集北大，迁怒蔡氏。更有少数以卫道份子自居，以去除蔡氏来打击新文化运动，因此，在这种艰危的处境中，蔡元培除了本身职责所在需劝导学生外，也须面对多方的打击和压力，但在学生被拘期间，蔡氏表现十分沉稳，营救积极，及至5月7日学生被释放后，蔡氏突然辞去校长职务秘密出京，且留下了“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的声明启示。蔡氏的出走很快的引起学界的激烈反应，而再次掀起一次扩及全国的学潮。近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挽留蔡氏。由此看来，蔡元培是注定要卷入这风潮中，他的辞职似乎并无法完全平息这场风波的再次发生。

其实，就群众性的运动而言，一旦激起了回响，实难以理智加以控制了。尤其是一班刚刚觉醒而对政府有着强烈不满的大学生。意识的醒觉与师长精神上的鼓励更使他们在初尝胜利后更坚信

运动是诉求的万能。因此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有理及无理的学运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最后导致整个运动不但无法引起共鸣，甚至是变了质，这确实非蔡氏所能控制的，这也是蔡氏所无法预测的结果。

从前面数章所叙述有关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理念，无疑是刺激了学生的思想和责任心，并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但从整个事件的发展上看来，蔡氏的理想似乎是被误用了，在缺乏适度的疏导下，学生因情绪的泛滥，不免也使得蔡氏的思想与地位被变相的思潮所淹没掉。因此，原不冲突的“救亡”与“启蒙”也被现实的偏颇发展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最初意义。而蔡元培在“启蒙”学生的美意上倒反变成学生努力“救亡”的原罪，这确也是蔡氏无可奈何之事。

从事件发生后的表现与态度窥视蔡元培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发现蔡氏的态度是矛盾和模棱两可。其实在五四暴发后，在感情上他是同情学生，这是出自于他原有潜隐在内心深处爱国情操的自然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他确实有些不能原谅学生的行为。因为这与他所倡



导的渐进改革与崇高的教育理念是有所冲突的。就在这种尴尬与微妙的心里下，抗议运动一潮潮如溃堤的山洪，迅速淹没学界，虽然冲走了猛兽，但却也带来另一种破坏。而身为学运的精神导师，却竟也只能眼见学潮泛滥而无法力挽狂澜。学生已因风潮而失去了判断的理智，那更甭谈到对蔡氏的忠言告示了。面对着如此束手无策的处境，蔡氏只好以辞职的消极手法，希望由此唤醒政府官员的良知和学生的理智。但蔡元培的这种做法不但无法达到其目的，而且令学生为了向政府施压以挽留蔡氏而变本加厉。因此，蔡氏当时的举动颇为令人争议。例如陈独秀就认为这是不敢面对问题的消极表现，而胡适则辩议蔡氏的行动将使国人更能警觉事态的严重而予以重视，或许胡适是对的，蔡元培在那个时代那种处境下，除了辞职以遏止波涛汹涌的学潮外，实在也是没有其他办法可行，毕竟时代使然，结果，也只好如此了。

## 结语：典型的夙昔

关于蔡元培对五四的贡献，历史早已有了定论，那是毋庸置疑的。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因此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虽不是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但却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从他担任教育总长，及至主持北京大学，都

显见他那充满着远见的报国理想，思想理论与实践并行、北大学风的整顿，校内组织的革新表现了他身为一代文化导师与教育家的巍巍风骨。没有他，或许大学生仍沈缅于传统的陋习中；没有他，北大学生不会有真正醒觉；没有他，北大学生也可能无法重拾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感，没有他可能五四运动将会缺乏意识和前进的思想，甚至五四可能不会由学生领头而起。王四杰就曾在〈追忆蔡先生〉中说：“北大师生，不断的向这些顽固腐败的传统势力进攻，摧毁了许多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给予全国青年一种新的头脑新的血液。这些思想革命的工作，不一定是由蔡先生发起；但对每一种运动，不论是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或文艺的，蔡先生决不是个同情者。他如果不是一个发起者，一定是个忠实的、勇敢的，始终不变的保护者。”所以可以这么说，对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启蒙上，蔡元培是功不可没的。

值此五四后 75 年的今日，思及蔡先生崇高的人格和行谊表现，再回头看看马来西亚和台湾大学生对时代和社会冷漠的心态及汲汲财富，而甘为职业工具的心识，并埋首考卷之中，将教授年年发着同样的讲义磨破读烂，却不知学问为何而感叹不已。历史翻滚过去了，75 年，大学生却依旧站在原点上，这是不是相当悲哀的一件事？因此，在五四逐渐临近的时刻，倒令我更加想念起蔡元培先生来了。

（完稿于 5/4/94 凌晨四点廿六分·  
春假中·台南成大光复室）





## 我国千万人聚会 声讨塞种族恶行

我国四万多不同种族、宗教的同胞，5月9日晚聚集在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以沸腾的情绪，激昂的声音，以及生动的歌唱与舞台表演，谴责塞尔维亚族迫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的暴行。

这项大集会是由卅九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波斯尼亚行动阵线”所主催，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及夫人，数名内阁部长，以及上述有关团体的代表也在场，参与其盛。

这项大集会展示了人民支持政府反对塞尔维亚族的暴行，以及不满联合国处理此问题，无方而失败，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引咎辞职。

体育场一片人潮，群情紧张而热烈。它的四周悬挂了标语布条，谴责塞尔维亚族的暴行，联合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坐视无睹。书写的口号有：“塞族恐怖分子是禽兽”、“上苍打救波斯尼亚人”、“打倒超级强国”、“开除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等等。

我国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的同胞，举行盛大的集会，展示力量关切目前正在地球的那一边进行的种族战争，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也显示我国人民对种族问题的觉醒。



(10/5/94)

①

②

- ①各族人士手持各种标语，表达他们对波斯尼亚人的同情。
- ②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忽然”出现，并在大集会上致词，掀起集会的高潮，右一是副首相夫人。

## 马华展开运动 为独中募基金

马华今日（27 / 5 / 94）举行推展礼，正式展开为独中筹募基金。现场获得八个单位的响应，总共捐献三百多万元。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披露：马华将通过电视、电台、报章、海报等媒

体，把“群策群力，发展独中”的讯息传达到每一个角落。筹款的第一个阶段是马华党员以身作则，每人至少捐出十元，而到年尾至少会筹到六百万元。筹款的第二个目标将扩大至群众，带动改变大众对独中的态度和思想，唤醒更多人支持独中。

董总主席郭全强、教总主席沈慕羽等华教界人士，也出席上述隆重仪式。

▶ 拿督士里林良实医生（左二）为“马华全国独中筹款”运动主持推展礼，陪同者包括堂联副主席拿督胡火山（右一）、董总主席郭全强（右二）、教总主席沈慕羽（中）以及拿督林亚礼（左一）。



## 马华每名党员 捐十元献独中

马华的独中筹款委员会开会决定，在全国马华六十万名党员间，发起每人十元运动，为独中筹措六百万元基金。

谈委员会主席兼马华副总会长林亚礼今日（28 / 4 / 94）指出：马华在这次筹款运动中，不单是向公众筹款，党员也以身作则，先行捐献。

马华为独中筹募基金的目标是超过两千万，最高为三千万。

据悉，这项为独中筹款运动，将于5月27日在芙蓉中华独中，由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正式推展。

（29 / 4 / 94）

## 砂五华团要求 发展华教独中

砂劳越五大华裔团体今日（23 / 4 / 94）联合向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提呈备忘录，要求中央政府以发展政府学校的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华文独中。

备忘录也建议政府如在沙巴一样，资助砂劳越的华校。与此同时，对华小华文科目教师短缺的问题，采取补救措施。

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今日下午在国父大厦与五大华

人社团领袖领导人举行闭门对话。

他向华社保证，政府会认真关注州内华教与独中教育发展。

砂州五大华团提呈的备忘录，包括要求政府承认台湾学位、电视台增扩华语节目、允许人民装置碟形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节目等等。

（24 / 4 / 94）



## 王超群接掌教总 陆庭谕留任副座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公会（教总）今日（28/5/94）举行常年代表大会，选举新届理事。

选举结果，出乎预料，一直受看好是沈慕羽接班人的陆庭谕，竟被来自森美兰教师公会主席的王超群，以15对11票击败。

领导教总长达28年的沈慕羽今日卸下教总的主席职。因此，所谓“沈慕羽时代”即划上休止符。

新任教总主席王超群表示，基于国内外气候和局势的转变，教总将调整过去的斗争方式和思想，以迎合目前的新趋势。

不过，他也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华教今日得以保存，是董教总过去奋斗的结果。今后的教总仍然会对不利华教的政策和条文保持警

## 邱继炳捐一百万元 予董教总教育中心

我国华裔企业家丹斯里邱继炳捐献一百万元予董教总教育中心，充作基金。今日（17/5/94）由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移交，由教总主席沈慕羽领取。

这项捐款是由丹斯里邱继炳所设立的希望基金所拨出的。希望基金今日总共捐出五百万元予六十个团体，董教总是其中一个受惠团体。副首相拿督斯里在台上以华语向沈慕羽问候：“你

好吗？”沈老回应：“谢谢你。”

董总主席郭全强表示，丹斯里邱继炳通过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移交这一百万元的捐款，意义重大。这不但但是董教总教育中心获得的最大一宗捐款，而这样一来，将可消除华裔企业家捐款予华教的心理障碍，带动更多华裔企业家捐献教育。🕒

（18/5/94）



▲王超群（左）当选为教总新主席后受到卸任主席沈慕羽和竞选主席落败的陆庭谕的祝贺。

惕，并将采取像过去一样的坚定立场。

他说：虽然他本身是马华党员，但这非意味着他会把党性带入教总。🕒

（29/5/94）

## 关丹与甘马挽 将辟为自由港

我国内阁已基本上同意将关丹与甘马挽港口辟为自由港，以便在东海岸工业走廊中扮演更有效的角色。

这是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林良实今日（27/4/94）出席内阁会议后，受询问时所披露的讯息。

关丹港口是一个普通港口，水深十一至十二公尺，八十五巴仙来自世界的船只不进入该港。而甘马挽港口，则属于深水港口，大型或特型的船只都可使用。④

（28/4/94）



●吴德芳



●林良实

## 吴德芳领导堂联 将检讨华团宣言

雪华堂会长吴德芳今日（28/5/94）在无对手竞选下出任堂联第二任会长。他表示堂联将召集签署《华团宣言》的廿七个华团，重新检讨过去所签署的《华团宣言》，以配合国家局势的发展，“制定一个新方针，以领导华社朝向廿一世纪”。④

（29/5/94）



## 李光耀的“后悔”

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的职位，历时31年，将近三分之一世纪。他在1991

年退休时，也未完全退休，而转换一个职位，担任新加坡内阁资政。

李光耀于18/4/94在澳洲的一项商业会议上指出：他领导新加坡31年，开始掌政时，由于经验不足和理想主义，而给予女人和男人同样的教育及就业机会。

他对这一点，即给男女平等。现在感到后悔。因为，他发觉给女性与男人“同等的受教育及就业机会”，使她们较难找到丈夫。他说，在1981年，他发现新加坡有六十三巴仙女

大学毕业生一直未嫁，名花无主。而男大学毕业生，则多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子为妻。现年的情况，近来已有改善，约有五十四巴仙的女大学毕业生嫁同等教育水平的男性，但仍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嫁给教育水平较低者或一直未嫁。

他将此现象归咎于观念的作祟，因为亚洲男人不喜欢妻子跟他们一样能干或入息高过他们，这样会令他们感到丢脸。④

（20/4/94）



## 中国将再下令 严禁用繁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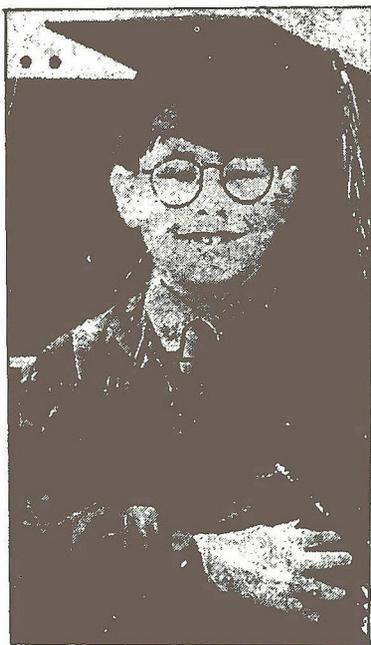
(北京 29 日讯) 近年来, 中国使用繁体字的情况愈来愈多, 市面招牌、商品标签出现愈来愈多的繁体字。中国为统一字体, 最近将再下令严格禁止使用繁体字。

据了解, 规定除了下列几种特殊状况外, 一律要使用简体字:

一、“五大领袖”的题字。五大领袖是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 二、郭沫若和鲁迅这两位被获得当局最高评价的文化人, 他们的题字也可以繁体字出现; 三、书法家的作品; 四、老字号的招牌, 例如“全聚德”烤鸭店, “荣宝斋”艺术品店等。

这样的规定可能引起一些执法上的困难, 例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题字时, 常喜欢用繁体字。 (22)

(30/3/94)



●神童卡尼预拍“四方帽”照片, 迎接大学毕业。

## 神童推翻弱智诊断 年仅十岁大学毕业

[美国亚拉巴马州九日综合电] 卡尼刚出生时, 医生们都预言他是个弱智儿童; 今天的他智力确跟常人不同, 但绝非弱智, 而是天才神童, 十岁的他, 今天六月将毕业于南亚拉巴马州大学!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 年纪最轻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是十二岁, 卡尼在一个月后肯定打破这项世界施录, 而且还是以荣誉生的佳绩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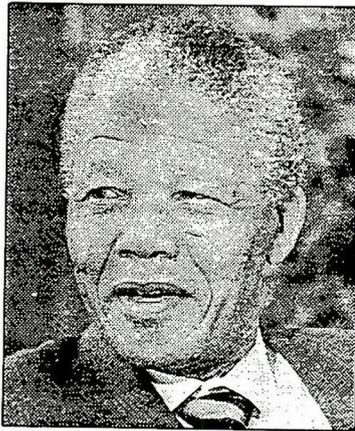
卡尼的母亲凯丝迪至今还不相信爱子是个天才。她说: “卡尼早产了两个半月。由于他在我腹内突然停止生长, 医生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只好剖腹把他取出。”

卡尼出生时, 体重不足四磅, 身長仅十一寸, 医生告诉凯丝迪和她的丈夫基文, 说这个孩子长大后极有可能变成弱智。

任职于美国海军部的基文说, 事实却刚好相反, 卡尼四个月大会说话, 八个月时已懂得阅读文字。凯丝迪说: “那时我们带他进超级市场, 他竟然懂得读出牌上所写的货品名称和价目。” 三岁时, 卡尼已懂得计算代数, 六岁便高中毕业, 八岁已从两年制大学取得地理学副学士学位。

卡尼在南亚拉巴马州大学攻读人类学, 这位四尺四寸高, 智商超过二百的小神童准备考入研究院深造, 但还未决定要选读哪一科。不过, 他知道自己最希望得到的毕业礼物是什么: “我想去欧洲迪士尼乐园游玩, 听米奇老鼠说法语, 一定十分有趣。”

还是小孩心性的卡尼, 被问到他的第一志愿时, 表示至今还未有决定, 不过却希望十八岁来临之际, 可以到电视台客串当有奖游戏节目主持人。 (22)



●曼德拉总统

## 结束白人统治 新南非诞生了

南非结束了白人几百年的统治。

它在四月廿六日至廿九日举行的大选中，由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大胜，在四百个国会议席中，赢得了二百五十二个。

曼德拉在今日（10/5/94）宣誓就任，成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

后，对前来祝贺的十万名群众发表谈话指出，他组成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将致力于消除贫穷，吸引投资和制造就业机会，以重建国家的繁荣。

他说：摆脱种族隔离政策，迈向自由的前面是一条崎岖的道路。要把我国和人民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泥淖解救出来，我们需要决心和毅力。

来自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组织的代表，受邀出席了这项深具历史性的仪式。



## 新南非简介 新国歌

一首有九七年历史的非洲抒情赞歌，已在黑人第一次获得投票权的民主选举中，成为新南非的正式国歌。这首名为《上帝保佑非洲》的歌，是黑人牧师伊诺克·桑汤加在 1897 年谱写的。

这首歌词前段的大意是：主啊，我们的上帝。保佑非洲，保佑我们的家园，祝愿她昂首阔步，愿你听取我们的呼喊，愿你给予祝福。

### 政坛新构架 民族团结政府

大选后，南非将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在全国大选中获百分之五以上选票的政党

将进入政府。新政府任期为五年（1994—1999年）。

### 制宪议会

大选产生的新南非制宪议会的两院制，国民大会（下院）有四百名议员，由全国大选产生；参议院（上院）有九十名议员，由各省立法机构选举产生，每省十名。制宪议会将制订南非新宪法。

### 总统

新南非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副总统由最大的政党产生；第二副总统由第二大政党产生。

### 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

南非全国将分为九个省，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和总理，都有权制定自己的宪法，但不得与全国宪

法相抵触。

### 经济现况

南非三面环海，矿藏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占整个非洲面积的百分之四，人口占非洲的百分之六。是非洲大陆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 经济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一千零七十四亿美元（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千八百一十二美元（1993年）；增长率：百分之一（1993年）；1994年将增长百分之三至四。

### 排行榜

黄金、铂、锰等六种矿产品的储量和产量居世界第一；钛、钻石居世界第二；磷酸盐、锆、镍居世界第三。





## 助病人安乐死 医生获判无罪

美国一名医生凯沃基恩(65岁)被控告于去年(1993)8月协助病人海德(30岁)自杀。海德患的病是致命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便他症。

凯沃基恩在作证时，公

开承认提供海德自杀用的一氧化碳气体。他说其目的是解除海德的痛苦。

这宗案件经过三天审讯及约十小时慎重考虑后，陪审团在2/5/94裁决凯沃基恩医生违反密歇根助人自杀禁令的罪名不成立。

这是一宗深具争论性的案件，陪审裁决无罪，具有重大意义。

凯沃基恩宣判后表示，他打算与其他医生合作拟定助人自杀的准则。

他说：“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医学上的支持。我们将拟定准则以便能正确的运用，而民众必须发挥影响力推行它，不是立法者。”

(4/5/94)

## 四川发现大古墓 疑是刘备葬身处

(四川廿六日讯)考古学家日前在四川省彭山县发现一座特大古墓。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士说：四川从古至今没有几位皇帝，已发掘的前后蜀皇帝王建、孟知祥墓，其规模与此次发现的特大古墓相比，差之甚远。从其方位、地形、阴河的规模格局上说，这无疑是一座大型帝王陵，不排除迄今还是谜的刘备墓的可能性。

新发现的这座古墓，呈圆锥形，坐落在地势偏僻的莲花村境内，高约一、三百米，直径五、六百米，顶部呈铁锅扣形状。比驰名中外的秦始皇陵还要高大得多。一条名为阴河的河流环绕在山半腰。山坡周围，有五座山峰环绕，将圆锥形的山坡花蕊似的包··在其中，恰似一朵莲花，莲花村由此得名。

当地民谣说：“要找刘备坟，新津出东门。进山三十里，就是刘备坟。”而此古墓正通于这一相同位置上。

据称，刘备在成都建都后，诸葛亮即为刘备造墓。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辞世后，灵柩运回成都，孔明巧布迷魂阵，埋没多处衣冠冢。

## 鲨鱼软骨制特效药

[北京十四日电]据墨西哥(至上报)报道，一种新的自然产品日益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就是鲨鱼软骨，因为它可能成为治疗癌症、关节炎、牛皮癣、肠炎等的特效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医生兰格说，看来是鲨鱼软骨含有活性蛋白，抑制了为肿块生长输送营养并促使其发育的血管网的发展，鲨鱼软骨的治疗原理是抗血管生成，即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这样肿瘤就停止发育，

肿块慢慢缩小，甚至变成灰色一肿瘤组织坏死的迹象。鲨鱼的骨骼全部是软骨。

在墨西哥、巴拿马、美国、捷克、古巴等国进行了许多临床试验，而在古巴的试验尤为引人注目，十八名癌症患者的病情全都大有好转，其中一名妇女腹部长有十二公斤重的肿瘤，几乎不能行走，但服用鲨鱼软骨胶囊十六周后，肿块大大缩小，并成功地作切除手术。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鲨鱼软骨无毒性，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

(15/4/94)

# 漫谈“堂号”之创立 及其历史、时代意义

■苏庆华

## 前言：

华族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特别是家族和宗族观念。即使因经济活动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抑或天灾人祸而迁徙，处于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始终没敢忘怀其本源。此种伦理精神之凝铸及宗族观念发挥之团结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姓氏堂号之维系。

## 堂号之创立

根据林嘉书之解说：堂号乃华族姓氏宗族支派根源之称号。堂，为姓氏宗族之庙堂；但其表示者乃某一宗族之根源。称某堂号，所表示者，实为某姓氏之宗族支

派。类此堂号，不仅出现于宗祠之上；于谱牒、墓志上亦常见之。如：“清河”此一堂号乃张氏之表，张氏族谱冠称“清河张氏族谱”；张氏墓碑则作“清河张氏某某之墓”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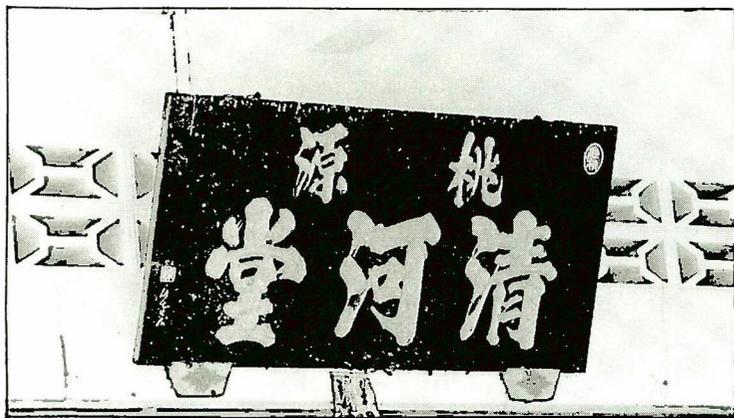
至于“堂号”，一般乃以“郡号”为基础。所谓“郡号”，除郡名外，时而混和些诸侯国名，府州、县名等。郡，乃秦、汉时行政区域之建置。汉行郡国选举，魏用九品中正，晋制郡公郡伯，均以郡中有财势之人来立姓，作选官用人之准则。流传沿用已久，族大势盛，乃以各姓发祥地郡名为堂号。

又，某一姓氏若自其发祥地迁徙他郡，并于此流传

蕃衍，渐为该郡之大族巨室，乃称此姓氏为“望出”某郡。王国氏称此“望出”某郡，以名望显贵为基准之“郡望”，为“分堂号”；而以某族发祥地为依据者为“总堂号”。

虽然，上述发祥地和“望出”之郡，有时亦合称“郡望”；也有仅将发祥地混称为“郡望”者。可见郡号之下的“总堂号”与“分堂号”往往难以区分。杨绪贤氏乃建议将二者统称为“郡望堂号”。

此外，各姓氏支派间，也有因祖先道德声望，功勋事业，科举考试，文学成就，或取义于吉利祥瑞，或取义于训勉后代向上心，用以区别于其他支派而独自创



## 堂号之历史和时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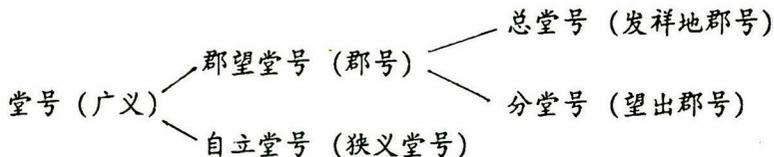
木有本，水有源，以木本水源作为子孙慎终追远之依据，乃传统伦理精神之体现。至于编号族谱，志其宗族来源以自贵，乃当日社会流行“以地望来分别族类”之风尚使然，其于历史上产生之功能与意义已如上述，毋庸赘言。个别以郡号加诸姓氏之上者，其用意不外想永记世系，表示其不忘本源罢了。以此形式来纪念祖宗，或以之在宗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和联络网络，在本邦今日的华族社会当中仍不鲜见，特别是强调以敦睦宗谊，光宗耀祖之姓氏宗祠。例如：檳城郭氏汾阳堂、威省大山脚黄氏江夏堂、颍川堂陈公司、济阳堂辛柯蔡宗祠、许氏高阳堂、朱氏沛国堂、檳州南阳堂叶氏宗祠，威省林氏西河堂、王氏太原堂，郑氏荥阳堂、檳城张氏清河堂、马来西亚洪氏炖煌堂等名称，无不将个别姓氏与堂号结合在一起。

在民居，于大门口上面悬挂堂号郡望的情形，一般多见于乡间、小镇。其堂号或以传统之黑底金字木匾

立之堂号。类此堂号乃同一郡望下，同一支派近亲间的标志，其包函面自然远比包括全族之郡号来得狭窄，是为“自立堂号”，亦即狭义之“堂号”。

兹将杨绪贤氏上说图示如下：

据上图，则“堂号”与“郡号”之区别关系，实不难明白；而郡号下的“发祥地”和“望出”两种，虽有所不同，但由于姓氏书往往单用“某某族”或“望出某某”而未予区分，故可不必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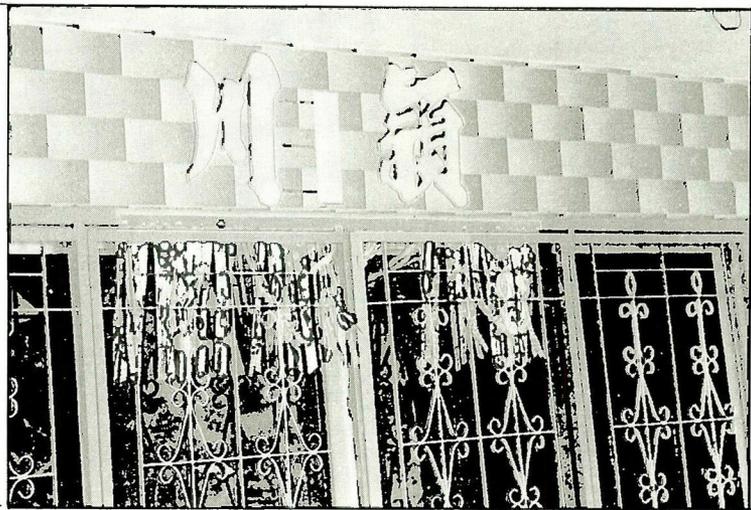


刻写，或镶以镜框，用黑汁书写于大红纸上，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要皆以明其世系为旨意。故而，自其悬挂之堂号，吾人大略可指出某户人家究为何姓氏。如：

“颍川”、“西河”、“弘农”、“陇西”、“清河”、“武功”、“江夏”、“南阳”、“太原”、“延陵”、“豫章”、“内黄”、等堂号，均为大家较熟悉者。见到类此堂号，吾人即可指出其为姓陈、林、杨、李、张、黄、叶、王、吴、罗、骆等人家。

当然，上述姓氏堂号通常并非独一姓氏所专用，例如：“西河”此一堂号，除了林姓之外，代表姓氏有单、宰、相、靳、隗、毛等。“弘农”，除了杨姓之外，代表姓氏有刁、谭、牧、虢等。“颍川”，除了陈氏之外，代表姓氏尚有邬、赖、钟等，“陇西”，除了李姓外，代表姓氏有牛、关、时、彭、董等。之所以直接将某堂号联系到某姓氏上（特别是陈、林、李、杨诸大姓），乃因共用同一堂号之其他姓氏人数在本邦不多，有些姓氏根本不在这儿出现过。故而，以之与某大姓联系，可谓屡试不爽。

还有一点，就是某一姓氏可能用超过一个堂号。除



了“望出”某地的“郡望”或“分堂号”外，有些乃因所谓的“自立堂号”所致。例如：朱氏，一般均用“沛国”此一堂号，但亦有用“凤阳堂”者，其典故安在？王国氏注曰：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于濠上赴，灭元而有天下。濠为凤阳地，后人立为堂号。郭姓之堂号乃“太原”，而吾人较熟悉之“汾阳”实据“郭汾阳”，典故而自立之堂号。王国注云：唐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功为中兴诸将冠，封汾阳王，世称郭汾阳，王姓则除了大家较悉之“太原”堂号外，亦有“三槐堂”之自立堂号，据王注：宋王祐为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世，人多称其阴德。尝手植槐树三株于庭，告家人曰‘吾之后世，必有

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祐次子旦为宰相，天下谓之三槐王氏，今王氏有谚：天下王，三槐堂，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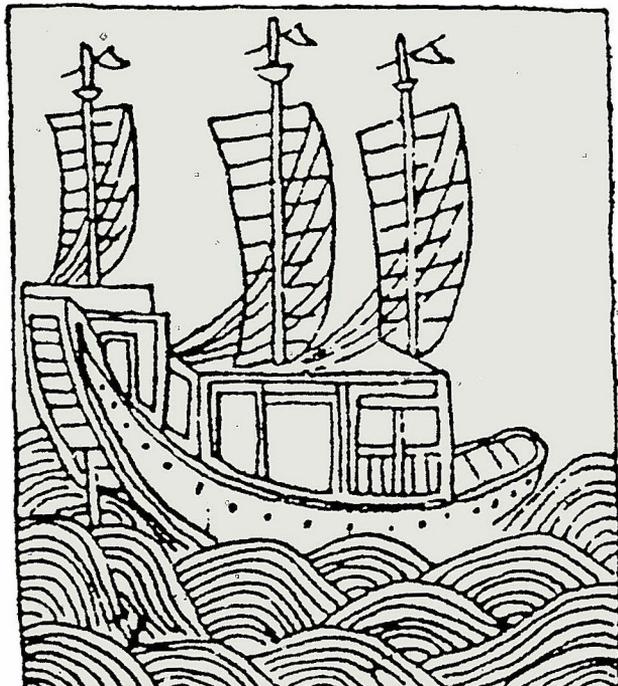
## 小结

综上所述，可知华族保存之堂号郡望，时至今日仅为慎终追远、木本水源之依据；或进而敦睦宗谊，促进互助精神而已。随着宗族观念在年轻一代日益淡薄，堂号之存在意义亦渐为人们所漠视，以致为数不少的人竟不知堂号为何物？或视之为一般招牌；或视之为不符合潮流之“古董”而嗤之以鼻。④

(注释从略)

# 郑和有到过 砂劳越吗？

安  
焕  
然



## 一、前言

《资料与研究》自第5期（1993/9/1）起连载了 John M. Chin（陈振声）著，黄顺柳译《砂劳越华人》一书。陈氏一书是至今少数几本集中探讨砂劳越华族社会史的专著之一。然而笔者在阅读其第一章〈早期历史：华人的出现与贸易〉时，竟发现陈氏在对早期砂劳越的历史撰述上，却存有不少值得质疑的地方。其中陈氏认为郑和（或其属下）曾到过砂劳越一事，最值得商榷。

## 二、郑和下“西” 洋的航行区域

明代的渤泥国，其地域大概包括婆罗洲的北半部，即今之砂劳越、沙巴、汶莱等地。而渤泥国在元、明的古籍中皆是把它列入“东洋”的范围之中。

有关东、西洋的划分，始于元代文籍如《南海志》、《岛夷志略》等（而在宋代就已有东、南、北洋的划分，见《岭外代答》、《真文忠公文集》）。至明代后，如《东西洋考》等则对东西洋的分界愈加明确。概言之，明代对东、西洋的界定有数种说法。有者（如冯承钧）以马六甲海峡或以爪哇岛为东西洋的分界；有者以《东西洋考》卷五云：“汶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为依据，认为今婆罗洲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然无论界定各有不同，但元明史籍中的“西”洋，却从未包括过婆罗洲（加里曼丹）。

其实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是指沿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今之越南、柬埔寨，过南中国海，极东至爪哇，西行至苏门答腊，穿越马六甲海峡，停驻马六甲，跨印度洋，至锡里兰卡、印度、中东，甚而更远的东非。这一东西海交传统上的西洋针路航线实不曾包括过婆罗洲以东（如“渤泥”及菲律宾等东洋之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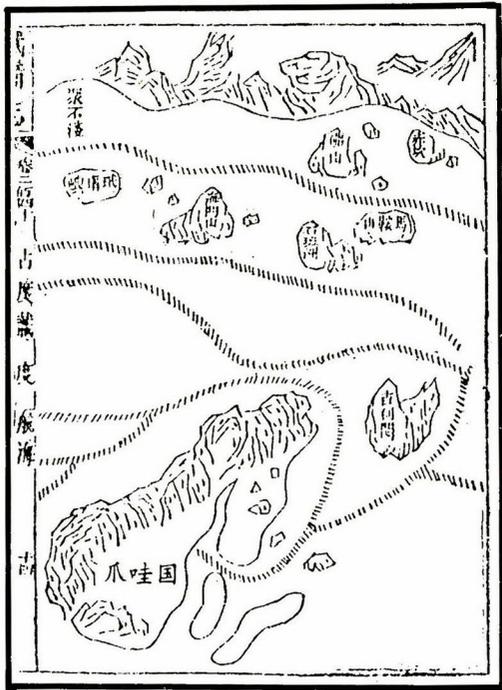


### 三、有关的一手史籍不曾述及郑和到过“渤泥”

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一手史料中，亦未有任何一条曾明确述及郑和（或其属下）到过“渤泥”。时下为诸专家所公认，在伴随郑和一同下西洋的随员所著的三本著作中，其中马欢之《瀛涯胜览》和巩珍之《西洋番国志》均不记有“渤泥”国条。而另一本郑和随员的著作，费信之《星槎胜览》，虽在其“后集”中收有“渤泥国”条，但根据其天一阁藏本，在其序言中，费氏就曾自言其“前集者亲监目识之所至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渤泥国”正好是收在其后集，所谓的传闻之国中。而且其所记均全采自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见冯承钧的《星槎胜览校注》）。因此我们不应武断地就把这条文献作为是郑和船队曾到过渤泥的依据。

同时期，为郑和等所立的石碑，如《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碑》等碑所载之国也不曾记有“渤泥”一国。另，祝允明《前闻记》记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程，述及船队过南中国海时，亦仅记《二十四日到占城……二月六日到爪哇，六月十六日开航，二十七日到旧港……》而不述及有达“渤泥国”。

此外，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图》，收在《武备志》卷240）中，也未绘有“渤泥国”。但却绘有一大岛“万年屿”。向达认为“据图”“当在今加里曼丹”惟“今地无考”。以地望来看，笔者亦以为“万年屿”很可能是今加里曼丹西岸的某一地。然查海图，其中志有地名而郑和未到者，比比皆是。况且海图上，在述文及针路上，均未标示有到达万年屿的讯息，而是“擦身”万年屿而过，经假里马达（加里曼丹西部外海上之 Karimata Is.）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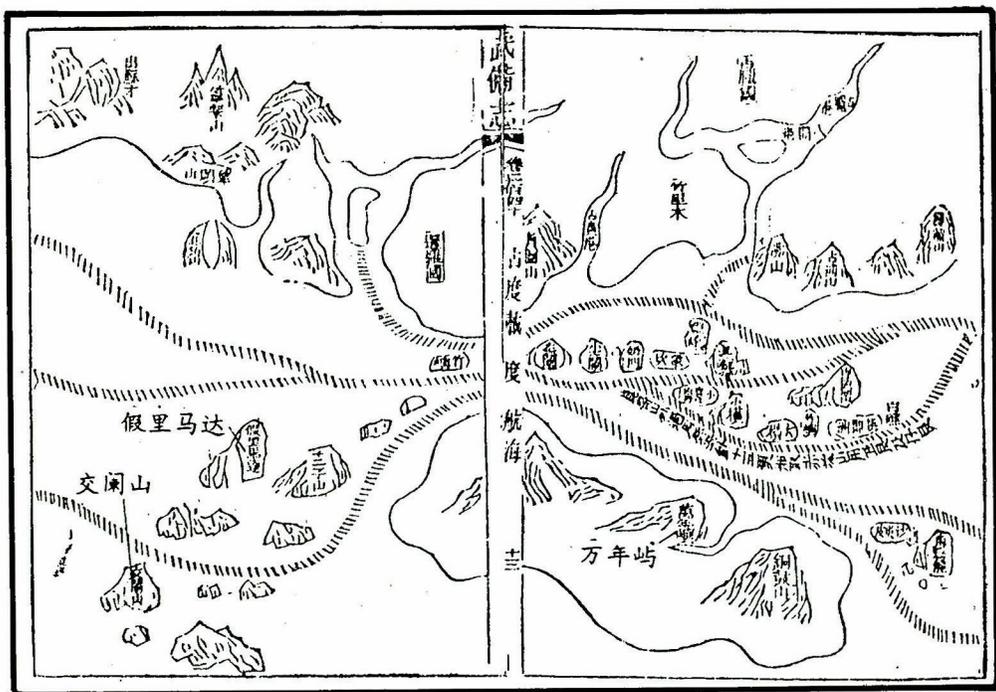


交阑山（加里曼丹西南 Cape Sambar 海上 Gelam Is.）而达爪哇国。故它是条越南中国海，沿加里曼丹西部海上诸岛屿（但却不涉入加里曼丹本岛）而直达爪哇的航线。这是西洋针路航线上一条极东的固定航线，有资料显示，它在元代时就已臻成熟，明初，郑和承之。因此《郑和航海图》也未能确实证明郑和船队曾到过渤泥。

因此我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其目的地和航程，仅是缘西洋针路航程上的“西”洋诸国（以及东、西洋交界点上之爪哇）。至于东洋针路上的渤泥，其针路方向和航海路线均与西洋针路不同，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职权所在，郑和船队实没有必要为了要到渤泥而偏离其西洋针路上的主航线。

### 四、陈氏对于郑和到过砂劳越的论据

陈氏认为郑和（或其属下）有到过砂



● 《郑和航海图》经爪哇部分

劳越的论据，在文中主要有两点。

首先，陈氏虽言“相传郑和曾二度途经婆罗洲，至于有无停船上岸则无从查考”。但紧接着就说“但相信他的一些属下曾经这么做。”此话含有颇重的“想当然”的臆度意味。接着又以永乐三年（1405），渤泥国王遣使向明廷朝贡一事，认为正好是郑和下西洋的第一年，而论证说“此事”（渤泥使节朝贡）“便可作为‘此事’（指郑和曾到过渤泥）的证据。”但笔者以为这两事（渤泥朝贡和郑和下西洋）其实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考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虽是永乐三年，但四年（1406）尚在苏门答腊的旧港，五年（1407）才回中国。途经诸地乃西洋诸国（最远达印度古里）而没有资料显示曾达渤泥。实际上在同一年里，做各不相干的事，是很正常的，何必硬以郑和一事来附会呢？再者，查《明实录》中，明廷专程遣使至东洋诸国者比比皆是（却没有一条曾提及遣使者是郑和）。更重要的是，同

年（1405），《明太宗实录》卷47冬十月丁卯条记成祖遣使“婆罗”等六国。“婆罗”当为今婆罗洲（或为婆罗洲的某地），而且六国中尚含有“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可知此《明实录》条所记与郑和下西洋是两件不同的事（《明实录》记郑和出使西洋诸国是在卷35六月条）。若要说1405年明朝使者曾到过砂劳越，那当是此卷47中所记之使节团，而绝不会是下“西”洋的郑和。

陈氏又说此次朝贡是“自1082年（即宋朝元丰五年）以后，这还是渤泥第一次再向中国朝贡。”这更是大错特错了。查《明实录》，渤泥在洪武（即明太祖）四年（1371）就曾朝贡过明廷（见《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八月癸巳条）。而且在洪武七年三月，《明实录》更有云：“其他远国如……渤泥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可知早在永乐三年（1405）以前，渤泥就曾朝贡过明廷，而且是不只一次。我们在引用史料时，是应当更为谨慎



的。

其次，陈氏认为马六甲是郑和下西洋时的中途站。而“马六甲距离汶莱不远，又早有船只通航两地，因此可以确定自从郑和来过之后，这条航线上的交通就日愈频繁，其中自然以华人的商船为主。”在这里，陈氏不仅“默认”了郑和曾来过渤泥，而且还“发明”了一条以华人商船为主，从马六甲通往渤泥的“新”航线。

若言伊斯兰教徒、阿拉伯、印度商人以及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曾常来往于马六甲和渤泥之间，此论证尚说得过去。但若言是以华人为主开拓了这条航线，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我们并不是说郑和以后，华商不曾到过渤泥或马六甲。实际上明中叶以后的华人私商船只到达马六甲

或渤泥的次数是日愈频繁多了。只是华人到马六甲和渤泥事实上是通过两条不同方向的固定航线航行的，即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所谓西洋针路是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传统航线，经越南、过马六甲海峡，西达印度洋诸地。所谓东洋针路，是至明代才渐趋发达的航线。即从中国东南往东行，经台湾，南下至菲律宾，而达婆罗洲。故东、西洋二针路事实上是从中国出发，分东、西两线，往两个不同方向，行南北纵贯的两条航线。再查郑和以后，16—18世纪的中国航海针路史籍·《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其中多处述及华人商船到达马六甲和汶莱的针路航线，皆是各循东、西洋针路航行，但却没有一条是从马六甲来往汶莱的。故陈氏的论证不仅臆度之处过重，而且对中国海洋史史料的掌握亦是过於松散的。

另外，陈氏在文章的最后（“与砂劳越的接触”一节中）引用考古资料（如陶瓷出土）说明砂劳越在唐宋元时曾与中国有广泛的交往，但这种贸易活动到1370年明代以后却忽然消失，而认为“总之，有迹象显示到了15世纪中叶，婆罗洲岛上的砂劳越部分已经没有华人的踪影，不过他们却在汶莱继续逗留超过100年。”这无疑又是与前文说郑和到过此地自相矛盾起来了。而且在行文中又对渤泥、汶莱、砂劳越常常语意不清，不知究指何者。

## 五、明初中国与渤泥 （或砂劳越）的关系

说郑和没有到过渤泥（或砂劳越），并不表示明前期中国与此地没有往来。有资料显示，明廷与渤泥的政经关系是颇为密切的。

陈氏所引的考古资料，不是错引，但却是过于片面且已是过于老旧的考古资讯。因为他所引的仅是在今之古晋附近的山都望（Santubong）一地的考古报告。的



确，山都望的考古显示其在宋元之时确实是个常与中国有贸易交往的据点。但出土物，以陶瓷为例，却没发现有明代以后之中国陶瓷的出土，学者乃名之为山都望的“明代空白”时期。但这仅能说明至14世纪末以后，山都望一地没落了，但却不表示渤泥或砂劳越在明代以后不再与中国有任何的交往。惟这时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今天的汶莱和砂劳越的北部去了。据考古的报导，除了在今汶莱曾发现见有明代瓷器外，在今砂劳越西北端的尼阿（Niah）和米里（Miri）都有明代器物的出土，包括单色釉罐和明代青花瓷器（见戴国华编译《东南亚古陶瓷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1990. 1, P. 70）。可见15世纪以后（即明前期）砂劳越仍是存有华人的踪迹的。

再论明朝与当时婆罗洲上的渤泥国之朝贡关系。据不完全的统计，渤泥至少曾入贡明廷达九次之多。其中两次还是渤泥国王亲率使团来访（当中在1408年来访的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亦不幸病逝于南京。1958年考古发现了该王之墓）。而中国遣使渤泥者，亦至少有四次之多。《明实录》中有载使节的姓名包括张敬之、中官张谦、行人周航等，但却惟独不载有郑和之名。

因此我们以为虽然郑和（甚至其属下）不曾到过砂劳越（或渤泥），因为郑和仅是通往西洋诸国，而未曾到达过婆罗洲以东诸地。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与渤泥之间不曾往来。历史事实证明，此时期两地间的交往是频繁的。惟明廷的使节不是郑和罢了。或许是因为郑和的“功绩”太大了，以致今人过分夸大了郑和下西洋，甚而神化郑和，以致常把当时同代一些与郑和毫不相干的事，在有意无意之中附会在郑和身上，在“过分”夸大郑和之际，反而可悲地掩盖掉部分历史的真实面。



# 稿約

《资料与研究》是我国一份别具风格的期刊。它致力传布讯息知识、文化、艺术、教育、政治、经济的学术研究心得，以及有关课题的论述，内容丰富，它是关切国家社会与华社事务者的读物。

本刊的编辑导向是“掌握时代的脉搏，激发人文的关怀”。

惠稿请注明中英文姓名、地址及电话。发表时务要采用笔名，悉听尊便。

翻译稿须附原文、出处。

本刊编辑部保留删改来稿之权力。

如欲退稿，请附上回邮。

作品被录用发表，稿酬每千字至少三十元。

来稿请寄：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收

HUAY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 03-2734035 Fax : 2734087



● 张爱玲的「荒凉」感，是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促和破坏的反应。

## 张爱玲

# 颓废与世纪末

■ 李欧梵

我们终于到了廿世纪之末，距《倾城之恋》又过了半个世纪了。我们真的也面临到整个文明毁灭的危险，甚至西方所有“后现代”的理论，似乎都在否定历史。

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视为“颓废艺术”，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我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极富“世纪末”意识的作家，她对历史的看法，就和“五四”以来的传统——把历史视为进步的宏观叙述——不同。她在《传奇·再版自序》中就开章明义的说：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的“荒凉”感，正是她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促和破坏的反应，她并不相信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而最终都会变成过去，所以她把文明的发展也从两个对立的角度来看：升华——这当然是靠艺术支撑的境界；浮华——则无疑是中产阶级庸俗的现代性表现。她小说中的上海在表面上仍是一个“浮华世界”。

## 传统“现代化” 的反讽

如果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豪壮的、锣鼓齐鸣的大交响乐（这个张爱玲的譬喻颇为恰当，因为交响乐本来就是西方十九世纪发扬光大的产品），那么张爱玲所独锺的上海蹦蹦戏所奏出的是另一种苍凉的小调，而这个小调的旋笔——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复杂的艺术过程。因为她所用的是一个中国旧戏台的搭法，却又把它作现代反讽式的处理；旧戏台的道具都不是写实的，而人物也都是神话传奇式的角色（但并不排除人物本身行为和心理的写实性）；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都像是一台台的戏，所以手法也不全是写实的，象征意味甚浓。她非常注重舞台上的细节和“细品”（Detail），最近颇走红的女学者周蕾（Rey Chow）曾在一本书中把这种细节和张爱玲的“女性”艺术联在一起，但张爱玲的“女性”艺

术精神又是什么？我觉得在谈女性主义之前，恐怕还是要先谈谈张爱玲艺术上的现代性，因为她在细节的布置上融入了不少时间和历史的反思。而这种反思的方式绝对超出中国戏曲的传统模式。换言之，张爱玲小说的戏台所造成的是一种“间杂效果”：它不但使有些人物和他（她）们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疏离感，而且也使观众（读者）和小说世界之间产生距离，这个距离的营造就是张爱玲的叙事手法，是十分现代的：在故事开头往往提供一个观点，而在故事进行过程中处处不忘把景观的细节变成叙事者评论的对象；有时把东西拟人化，而更惯用的手法却是把人身的部分——如嘴唇、眼睛、手臂——“物质化”，使我们阅读时感受到一种观看电影特写的形象的乐趣。有时候，我们不仅在观看人体，也同时在窥视人身内部的心理。

张爱玲小说中有些“道具”——如屏风、旧照片、胡琴、镜子——都具有新旧重叠的反讽意义：它从现代的时间感中隔离出来，又使人从现代追溯回去，但又无法完全追溯得到。我们似乎在这些小物品中感觉到时间过程，但它又

分明地放置在现代生活的环境里，甚至造成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不安。那么，这种不安的原因又何在？我认为张爱玲小说中所道出的是好几层故事：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当然是最表层的，而这个表层的故事也不外是悲欢离合，和旧小说无大差异。然而当我们再检视这个日常生活的背景，就不难发现另外一个层次——我称之为前景和背景的重叠和交错。张氏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放在前景，但这些人的行为举止和心理变迁却往往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前展开的，而这个特定的背景就隐藏了历史，是现代的，而不是旧戏中的古代。

## 前景加背景 的苍凉效果

譬如《封锁》这个故事，男女在电车中相逢相爱，电车停止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期的封锁，这种战争时期的作法，当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般写实或革命小说会把这个抗日的历史背景渲染得很厉害，甚至变成前景；但是张爱玲却把它淡淡几笔交代过去，而更着力于描写这两个孤男寡女在一个静止的时空



●白流苏的问题：文明毁掉以后还有真情吗？图为电影《倾城之恋》剧照。

中间所爆发的感情。这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发生的事，但又那么自然的发生了！这是张爱玲把写实和传奇两种模式交融在一起的技巧，使我们感到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的可贵。如果只有前景而没有背景——把故事放在无固定指涉的时空——它的“苍凉”效果也可能大减。

张爱玲的小说中我认为最具有“时代性”的矛盾意义——也就是用“传奇”的艺术手法来反述历史——的作品是《倾城之恋》。这篇小说一开头就把

时间放进故事的情境里：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所以，故事和历史，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显然是互相冲突的，之所以称为“传奇”，就是因为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可以超

越时间和历史。所以这篇小说中的两个主角都不尽写实，而是传奇性的人物。如果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游戏是故事的前景，那么这个前景的背后却蕴含了一个复杂的“背景”——我认为它是神话和历史的交织，但神话却又处处冲出历史背景的约束。在这两种背景的交织最突出的意象表现是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浅水湾碰到的一堵“灰砖砌成的墙”，这是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描述：

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 文明毁灭后的地老天荒

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描述，不难发现这是和张爱玲

在《传奇·再版自序》中的两句话呼应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

这断瓦颓垣的意义，正是张爱玲颓废艺术的精神所在，它又使我们忆起《红楼梦》中的断垣残瓦。在这个抒情时辰中，柳原悟到的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神话（从写实立场而言，他这样的浮华公子是想不出这种哲理的），整个文明的毁灭，是一个反文明、反进步的世纪末式的幻想；而将来的荒原却又使他想起地老天荒的那一类话——当我们读到这四个字，自然会加上三个字来补足这一句诗：地老天荒不了情？！所以，这句话的意义不是此情不渝直到永久，而是只有在文明毁灭后的地老天荒的“荒原”（张爱玲应该知道艾略特的名诗）才会产生真正的不了情，这岂不是颓废的最佳意义？！而真正有不了情的人，我想不会是范柳原这样的男人，而是“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所以白流苏这个角色，也像是人生舞台（蹦蹦戏）上的一个花旦，这一层的象征意义非常完整。因此，当真正的历史——日本炮轰香港——在故事中

展开后，它非但没有把这对情侣拆散（革命小说或传统言情小说一定会如此），却反而成全了他们的婚姻，这当然是极端反讽的：传奇终于“战胜”了历史，所以故事最后的评述就很顺理成章了，也更反讽地点出了“倾城”之恋的现代意义（与古代的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传统意义恰好相反）：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这真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结尾，它完全达成了张爱玲在卷首所谓的“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艺术目的。

## 在廿世纪末谈颓废

如果从历史的眼光再把颓废的故事演下去，她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大改革”，臆测的当然就是中共的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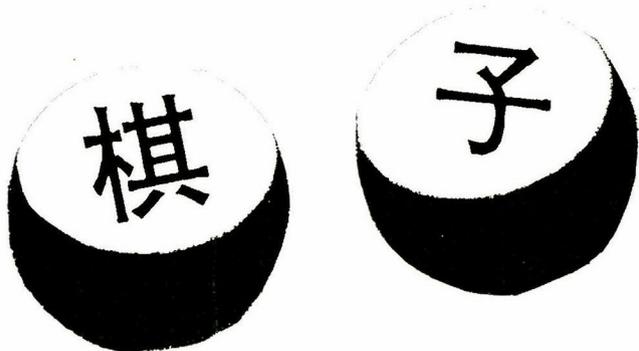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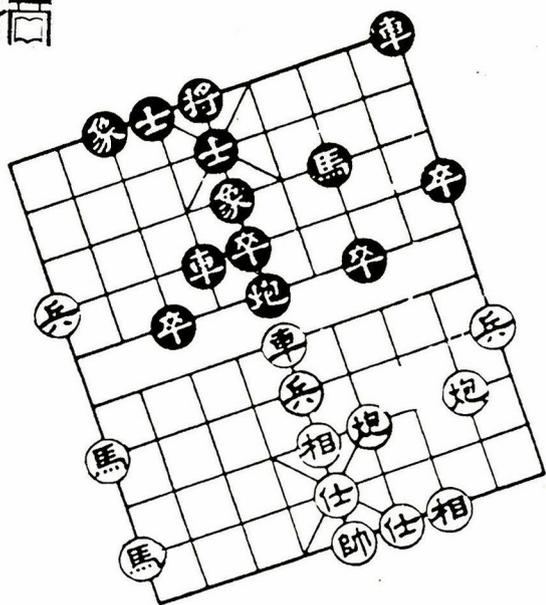
命，而成千上万的人（又岂止成千上万）真的已经死去，我们终于到了世纪之末，距《倾城之恋》又过了半个世纪了。我们真的也面临到整个文明毁灭的危险，甚至西方所有“后现代”的理论，似乎都在否定历史。那么，在廿世纪末谈颓废，其意义又何在？这本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我不禁又想到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世纪末的华丽》，这本书的作者朱天文显然熟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否则怎么会产生如此绝妙的臆想？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另一个白流苏——一个后现代的米亚，生活在一个和时间竞赛却也有瞬即逝危险的时装世界里，她最后的臆想，总算回答了范柳原，甚至所有男人——的问题：文明毁掉了以后是否还会有真情？

“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

转载自《明报月刊》

1994年1月号



“五四”运动时鲁迅发现中国乃是“吃人”的国度之后，引起知识者对故国文化的一场深刻的反省。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有一个悲哀的发现，这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不论是吃人还是被吃又降了一等。因为“五四”时所说的吃人和被吃，其前提都是“人”，即无论是吃的主体还是被吃的对象都应当是，而我却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同一代人以往却常常只是物——一枚统一棋盘上的棋子，即被吃的棋子和吃别人的棋子。这个发现，可算是对棋子人生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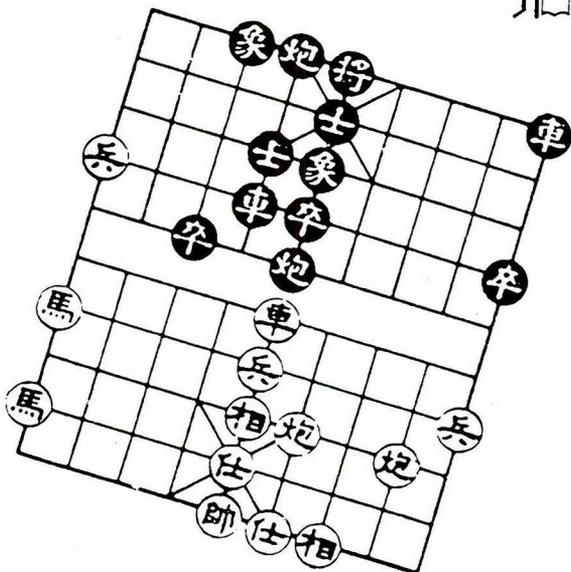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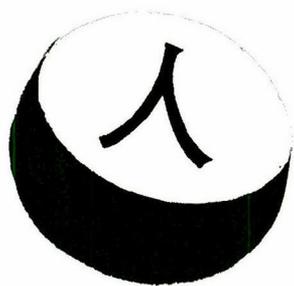
棋子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与能力。它在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的棋盘上，其身分虽有区别，但都是下棋者的傀儡：要么

作为傀儡被吃，要么作为傀儡吃别的棋子。无论吃或被吃，都只是一种中介，一种器具，一种物，其吃与被吃均低“人”一等，属于“物”层面上的吃与被吃。

先说被吃罢。棋子被吃，其实不是直接被人吃，而是被人指挥下的棋子吃。棋子之死，均不壮烈。因为统统不是死于英雄之手也不是死于真正的人之手，而是死于没有脑子和心灵的器物或低等生物之手：有时被“车”辗死，有时被“马”踩死，有时被“大炮”轰死，有时被“仕”整死，有时被“卒子”撞死，其死亡都不如被人吃掉惨烈，更不如被英雄杀死壮烈，死时全无感觉。

“五四”时讲“吃人”是象征意义上的“吃人”，

也就是指肉体上、精神上的被奴役、被压迫和被吞食。我所经历的所谓“被吃”也就是这种精神象征意义。而此时我感慨的是自己竟也像一枚棋子，吃我的竟也只是些被人驱使的棋子，猛人的指尖下的“物”。1989年他们批判我时宣称自己是“主义的大炮”。1989年之后大炮不响了，前赴大批判沙场除了少数是红学界和美学界的小“仕”之外，其他均是三流卒子。我称这些卒子为“小儒”，实在是抬高他们的。这些统一指挥棍下的“棋子”，所以批判我的时候，浑身都是塑料气，木头气和主人手指上的烟焦味，决无人的灵气和属于自己的语言。如果我真的应当被吃，也希望被狮虎般的英雄亲自吃，可留下一个



### ■刘再复

惨烈的故事，而现在却被这些肉棋子吃，留下的只有乏味的滑稽故事，所以一直觉得懊丧。

我也曾吃别人，在“斗私批修”的“火红”年代里，我被“帮助”过，也“帮助”过别人，所谓帮别人其实就是摧残别人吃别人。而吃人时并非真正愿意去吃，而是被人当作一枚棋子去吃。有时被当作“车”，有时被当作“马”，有时被当作“卒”，有时被当作“炮”。而且是绝对驯服的“车”、绝对驯服的“马”、绝对驯服的“炮”、绝对驯服的“卒”。被当作“仕”“象”的时候很少，被当作“帅”的时候则从来没有

过。我和许多同辈知识者被当作“卒”子往前冲的时候居多，被当作“大炮”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也不少。文化大革命时，十亿人成了十亿门大炮小炮（编按：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文革期间的实际人口数为：六六年为七亿四千五百多万人，七六年为九亿三千七百万人。）我也是其中的一门。那时候，革命领袖总是号召要统一步骤，统一指挥，“全国一盘棋”，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深意，知道我们正是这一盘棋中的一炮，一齐对准刘少奇，“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里的所谓炮打，也不是自己真正掌握大炮，而是充当炮灰而已，正像棋盘上的炮筒子。

是一枚棋子真有点晦气。作为棋子，吃与被吃，和真的人并不相干，譬如当“炮”去打“帅”（刘少奇）时，就从来也没见过这位国家主席的样子，而把我们当作棋子去“炮打”的统帅（毛泽东），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其实与我们也不相干。吃和被吃，都是别人指挥下的一场傀儡戏。想到这里，又觉得懊丧。

懊丧之余，想到鲁迅倘若活着，其发现的“中国民族乃是食人民族”的命题应当有所补充，大约要改为“中国民族乃是靠棋子食人的民族”。而我曾经历过的这一种人生，则可称为棋子人生。☹

回想以往，发现自己只

（原载于明报月刊）

# 禁食月的生理变化

马大医学院病理学  
庄思麟教授

自六世纪以来，每年回历九月从早到晚是每位穆斯林教徒的斋戒期。在这一个月內，每日的十四个半小时完全禁食和饮水，跟着再进食、喝水和休息。

由一群马大医学院病理学部门所组成的队伍经有系统地研究斋戒期对人体生理上的影响。绝大部份的穆斯林教徒在这段期间都有体重减轻的现象，体重急骤下降

最快是在斋戒的第二周，然后持续至整个月，平均的体重下降是约六到七磅。体重将会在斋戒期后恢复正常。这显示只要改变进餐的时间，而在进餐时不刻意戒食，也可以导致显著体重下降。那些欲减肥的非穆斯林教徒也可采取此方法。

在这期间，心跳的速度比以前降低了十至廿巴仙，这尤其是男性更显明。这情

况可能是反映虔诚的宗教情操引起的安宁心情的生理表现。

虽然在禁食期间，穆斯林教徒长时间禁食和饮水，却没有脱水的现象，可见身体有能力适应这新的生活方式。不过，血糖与贺尔蒙却有轻微的变动，只是这些变动对正常健康的人并没有不良的后果。④

## 治糖尿病新突破!

[伦敦十五日法新电] 英国《刺血针》医学周刊说，美国医学家也许已找到一种能治好糖尿病的法，这种新疗法可使病人不必每天注射胰岛素。

美国洛杉矶圣文森特医药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把一名死者捐献的制造胰岛素的细胞移植到一个患了糖尿

病三十年的中年人身上。

将于星期六出版的《刺血针》杂志说，在手术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这些细胞已开始制造胰岛素，并使血糖保持受控制的水平。

九个月后，这个38岁的男子已不再需要注射胰岛素。他的健康起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并找到了十年来第一份专职工作。

糖尿病人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因为他们胰脏里制

造胰岛素的细胞——郎格罕氏胰岛已被他们本身的防御系统破坏了。

郎格罕氏胰岛移植手术已有约二十年的历史，但过去手术的结果都令人失望。

这次移植的郎格罕氏胰岛是破天荒第一次用一层特殊的被膜裹住，保护这些细胞免遭体内免疫系统的侵袭。④

(16/4/94)

## 《砂劳越华人》第六章

一八六三年至一九四一年

## 华人移民与农业发展

/ 陈振声撰 ● 黄顺柳译

## 华人移民：招募、自愿与赞助

查尔斯·布禄克拥有如此辽阔的领土，也就加紧引进华人移民。他跟他的舅舅一样对华人存有某些偏见，但在行政方面，他却比舅舅略胜一筹。他讲求实际，有远见，无所畏惧。他很欣赏华人的苦干与创业精神。1852年他初抵砂劳越便已看出华人的潜能。他以一位年轻官员的身份访问伦乐时，便已观察到华人开辟数百英亩的土地种植粮食与其他农作物，真是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1866年，即拉让并入版图之后五年，他写道：如果将华人农民大批引进，他以为拉让是最适合他们安居的地方。他预见此处公路将会四通八达，拉让江上大轮船将会川行不息。1857年的叛变使詹姆斯·布禄克对华人大失所望，但查尔斯·布禄克却没有改变对华人的看法。他负责平乱，使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华人。华人也将他看成是一位意志坚强而果断的君主，常以铁腕镇压意图反叛的人，同时他也有能力使砂劳越成为一个稳定与富强的国家。因此在他管治下，不管是有文化的

商人、其他市镇居民、粗犷的矿工，还是不识字的乡区人民，都对他心诚悦服。于是国势日益强大，大家不只在财政与农业上互相合作，就是在华人移民的事务上亦复如此。

1860年中国战败，签订北京条约之后，臭名昭彰的贩卖劳工组织便开始活动。英国人招募十批华人劳工以开发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与其他属地。那些劳工掮客在条约规定下的各商港与在中国以外各地都十分活跃。他们为爪哇与马来亚的锡矿与橡胶园丘、古巴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园、加里福尼亚的金矿与铁路招募合约工人。这些掮客与有关雇主都大发横财。工人可就惨了，合约到期之后又再“续约”，他们直至老死方可获得自由。这种不人道的待遇一点也不使掮客和雇主们觉得内疚。自1860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这种合约劳工制度大行其道，东南亚的劳工市场是以新加坡为中心。新加坡在地理上接近古晋，早已跟砂劳越的华人与欧洲人商行有生意上的来往。所以多年来砂劳越一直从新加坡输入劳工是不足为奇的。

这时，砂劳越政府直接介入华人合约劳工的引进。查尔斯·布禄克在新加



坡设立代理处，先是 A. L. 约翰逊公司，后来是派特生·西蒙士公司，来处理招募事宜，这代理处也同时招募印度劳工到政府园丘工作与建筑铁路，只是他们人数有限。通过新加坡的这个代理处，以及查尔斯·布禄克于 1880 年代在纳闽设立的另一个代理处，他获得华人劳工为政府开采砂隆与布禄克敦的煤矿，并且也在马当试种烟草与茶。这些合约工人成为叛变发生后那段时期有如潮水般涌入砂劳越的华人移民的先驱者。他们为乡区农业打下基础，使农业不致于成为矿业的附庸。

通过新加坡招募工人并不能满足砂劳越的需求。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工人通常是些身败名裂之徒，如罪犯、欠债者、疯子、体弱多病者。查尔斯·布禄克无权选择。直到 1877 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才设立华民保护司以改善招工制度。保护司负责为劳工工作身体检查，以确定他们有能力工作，不过保护司只是敷衍了事，而且劳工等候分配工作的临时住所很不卫生，使到很多人到达目的地后弱得无法工作。“拉惹”拿这些合约劳工去跟另一些由华人商家与园主自己招募的工人相比，就发现后者强壮得多。

1890 年以后，新加坡在砂劳越的不断抗议之下才改善服务，“拉惹”也即刻颁发新的法令，在古晋设立清洁卫生的接待所收容新来者，他们可在该处等待别人为他们准备合约，在他们签署有关合约时，也有一位布禄克官员在场见证。“拉惹”也派出一艘轮船自新加坡免费运载新工人前来砂劳越。但这方面所提供的劳工既不可靠又不足够，到了 1914 年更逐渐减少到每次只有几个人而已。

“拉惹”对这种情况无法容忍，便征求古晋商人的意见，想从中国直接招募工人。起初，费用相当高昂，使这项计

划差点不能进行下去。1870 年以后的十年里，砂劳越经济日益繁荣，劳工日益短缺。于是又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从中国引进劳工到了这时候需要更多费用，但招募到的人一个个身强体壮，倒也相当合算。查尔斯·布禄克喜出望外，便坚决指定华人商家为他进行招募工作。

除了上述通过中间人介绍进来的华人劳工之外，还有不少移民自由进入砂劳越，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只为了响应当局的号召，或是为了投靠已经在砂劳越立足的亲友而来。大多数自愿前来的人都由华人与欧洲人大公司所雇用，以从事种植和开矿。这类的劳工来自不同地区，而新加坡始终是最重要的转口中心。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中国，但也有些先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或海峡殖民地做过工人之后，才来到砂劳越。后来，这些自由入境的人不再充当劳工，他们多是那些想到砂劳越来发财的商人，被布禄克所提供的土地所吸引的农人，还有那些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和一些知识分子。这些人通常由当地有身份、有地位的商人所赞助。商人在受到大园主的委托之后，也协助招请工人。有时，他们获得“拉惹”批准引进他们的同乡，以便向工农业进军。有些社会领袖委任代理人替他们招募并带领新客自中国飘洋过海而来。有些则亲自出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招募新客，一方面他可以趁机探亲，有记录显示，潮州人领袖刘建发曾于 1880 年代二度返回汕头招募工人。

## 飘洋过海的惨景

以下是查特所写的关于华人自中国抵步的实况。从他的生动描写中，可以看到一些代理人争先恐后登上帆船，引诱那些精疲力尽的旅客与他们签约。这段文字令人读了感觉趣味无穷。



● 1903年英华学堂全体师生合影。后一排第一人为富雅各。

“帆船常常乘东北季候风而来……甲板上挤满估俚，尤其是1889年黄河大水灾横扫中国之后，一些运气好的人在砂劳越发了财荣归故里，于是就有了“砂劳越遍地黄金”之说。中国的劳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难怪很多人不怕艰难困苦乘坐小帆船前来砂劳越。

“帆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如一片树叶，船上搭客人挤人简直转身不得，晕船的人很多，而每天吃一碗饭，每次只喝一汤匙的水，每天三次……”

“没有人知道帆船何时可以靠岸，有风吹动帆船船才会动，通常都要一段时间才会到达目的地……旅客在帆船下锚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却都有人雇用。一些老板甚至派人在砂劳越河河口守望，一有消息便回来报告，然后由老板登船，见人就硬塞半年薪金三十元入其怀中，这样就讲定了，以后那人便以每天一角八分的代价出卖劳力。那些钱其实也不完全是他们的，因为有中间人带他们前来，中间人先拿去大部分的钱，这些劳工比较受欢迎，因为他们比来自新加坡的那些人强壮得多……”

这样的描写有些地方未免太天真，但大致上还能反映从中国前来砂劳越的

人吃的是什么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些人身无分文的惨况。说真的，这些自愿前来的人处境并不比合约劳工好多少。他们都因家贫无奈才离乡背井冒险南来，连他们的船费都由别人先付，等他们来到砂劳越有了工作之后才清还。如果有亲戚或同乡照顾就比较幸运。无论如何，所有新来的人都得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依靠雇主。多数雇主同时也是赞助人，他们与新来的人若不是亲戚，便一定是同乡，讲同样的方言。来到砂劳越之后，这些人免不了要先当几年学徒，跟老板学做生意。如果住在郊外，就只好充当园丘的劳工。由此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界线分明，讲什么方言的人必定从事什么行业，这又决定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谈到。

上边讲到1863年詹姆斯·布禄克颁布的《土地法令》成了以后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的蓝本。查尔斯·布禄克作了一些补充，从而吸引华人前来砂劳越，也吸引新加坡的华人资金流入砂劳越，为大规模的种植业打下基础。在1875与1888年之间，新加坡与砂劳越的华籍商人至少参与三间由政府所赞助的大公

司，这些公司在砂劳越的好几个地方种植甘蜜与胡椒，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省的伦乐。1863年的土地法令规定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除非是公开出售或由“拉惹”批准划给某人。土地的租借期为999年。在租借三年之后，每英亩每年只需缴一元便可购买有关土地。如果地主不将已租借或已购得的土地善加利用，政府有权将它收回。强占政府土地的人无权拥有有关土地。一切采矿权属国家所有。查尔斯·布禄克于1871年重新厘定这项法令，并添加一些条款，如给予占用者补偿，与征用某地区以供公众使用，他同时以优厚条件吸引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前来砂劳越。在1880年代，此事曾在东印度群岛各地广为宣传。他也宣布马来人与达雅人的习俗地受到保留与尊重，特别是那些达雅人用来从事迁移耕种的土地。在他出任“拉惹”期间，他多次颁布宣言，说明政府的土地政策，譬如他规定那些前来定居的人可获得多大的一块土地，占用这类土地有什么条件，这包括政府为那些来自新加坡的种植人和投资者付还船费等等。这些条件后来还多次作出调整。大致上说，他成功吸引华人前来开辟大片土地以从事农耕，而那些华人后来也的确在指定的地点展开既定的计划。“拉惹”也警告达雅人与马来人不要随便出售土地，以免一些外国人，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投机分子和剥削者取得土地。“拉惹”不想见到好像在北婆罗洲与马来亚一些地方发生的事也在砂劳越上演。有人说“拉惹”担心的不是华人，而是来自欧洲的种植人。自1841年至1945年，布禄克政府都不给欧洲投机者以机会，这使华人在种植业与其他经济领域少去了竞争对手。

## 第一、第三与其他各省的垦殖区

查尔斯·布禄克将土地分给华人的

举措成为华人移民与定居的里程碑。从1898年开始便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在1898与1911年之间，政府四次赞助移民前来，让他们在第一与第三省开辟垦殖区。这包括定居在古晋附近的福建人，在拉让江盆地的福州人卫理教徒，在福州人垦殖区上游立足的广东人，以及一批在诗巫附近获得土地的兴化人。以人数的多寡，与后来在土地开发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而论，福州人表现得最出色。他们不是个别前来，而是有组织的集体移殖。合约是由“拉惹”与他们的首领签订。首领的责任是带领同乡到砂劳越永久定居，由政府发给土地。另外政府也给予垦殖民各种权利，以鼓励他们专心务农。那些在合约上签名的首领后来还被委任为港主，以照顾他的同乡。

最先抵步的是一批为数一百人的客家人。当时是1898年，后来他们加入基督教成为教友。他们分配到古晋以南三哩的双溪马昂与石角一带的150英亩土地以种稻。除了土地之外，他们也获得财政资助与免费的建筑材料。这些人后来改行种菜与饲养家畜，同时也协助教会宣传，“拉惹”曾对他们放弃种稻一事表示不满，但垦殖民成功的取得他的信任，又在与他们同来的江桂恩的引导下，全都皈依基督教，江桂恩后来成为古晋的一位知名人士。这些垦殖民的子孙仍有不少住在该地。

自1901年起，福州人分三批大举前来，定居于诗巫附近的拉让盆地。他们的人数比以前的任何一批垦殖民多。这也是“拉惹”扩大他的计划的直接后果。1880年11月29日他在《砂劳越宪报》上公布开放拉让江流域。他表示愿意与任何华人公司磋商，以引进为数不少过三百名的男人、女人与儿童。政府还答应为垦殖民建造临时住屋，免费提供白米与盐，为期12个月。政府保证有

轮船来往古晋与垦殖区之间，而收费廉宜。另外，也在垦殖区建造警察署以保护垦殖者。垦殖者必须答应永久居住于砂劳越。

如果不是黄乃裳具有百折不挠的领袖气质，“拉惹”将不可能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功。由黄乃裳带领前来砂劳越的福州人，与他们的子孙，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经济、发展、专业等领域领先于其他社群。黄乃裳跟早期的华人拓荒者一样将永垂不朽。

## 黄乃裳生平

黄乃裳于 1849 年生于福建省闽清县。当时是南京条约签订七年之后。此条约强迫中国对外来贸易敞开门户。西方的影响逐渐在中国扩散，特别是在各有关商港。这又使热心的教会中人也纷纷前来，他们将这拥有古老文化幅员广阔的国家看成是传教的好地方。其中有美国卫理教传教士，他们以福州为活动的基地。年轻的黄乃裳早期所受教育不多，在教会的帮助与鼓励之下，很快便成为知名学者。他考过乡试，中过举人，同时也变成卫理教最忠心与最热情的教徒。可惜当时中国国势衰败，对外国的渗透与控制深感恐惧。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新思想被中国的官民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多年来，满清的朝廷被慈禧太后弄得乌烟瘴气。这个老女人专横霸道，听信谗言，任所欲为。1898 年，一批以康有为为首的饱学之士推行改革运动，目的是将新的思想介绍进来，使中国变成现代化国家，他们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光绪是慈禧的外甥。光绪登基后，慈禧不得不退位。当改革的消息传入她的耳中时，她即刻夺回政权，她下令将皇帝加以软禁，并逮捕六名改革派领袖将他们处死。她激烈反对改革，



●黄乃裳

并鼓励别人反对西方文明，这导致反西方、反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如狂风般吹遍全中国。义和团想赶走洋鬼子和消灭基督教，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与天津，扑灭义和团，并迫使慈禧太后求

和。

黄乃裳既是卫理教教徒，又支持改革运动，当时所发生的事使他的理想破灭。他为家人的安全担忧，也为同乡的前途担忧。他到处旅行，曾到过新加坡。他的长女嫁给林文庆医生。林医生生于海峡殖民地，在苏格兰取得医生的资格，后来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一位非常出名的人。1900年事件发生之后，黄乃裳决定离开中国，前往南洋，为他的教友同胞找寻一片自由的土地以安居和祈祷。在新加坡他的女婿家中，他听到砂劳越“拉惹”招募华人农夫前去开荒的消息。这真是天赐良机。他带着一封由他的女婿写给砂劳越华人甲必丹王长水的介绍信，前往砂劳越晋见“拉惹”，并与“拉惹”订立共有三十一项条文的协议（见附录一），“以引进一千名华人农夫，包括男人、女人与三百名儿童到拉让江畔开芭垦殖、种稻、蔬菜、水果等等，其中不少过半数须在一年内引进，即1901年6月30日以前……”

在协议下，政府预先支付成人每名三十元，儿童每名十元，其中三分之二款项在新加坡移交承包者，余数则等有关人士在古晋登岸时付清。垦殖者在新加坡收到预付款项之后四个月内必须抵步。此项预支钱款须在六年内还清，头一年不须缴还，从第二年起一连五年每年摊还五分之一欠款。在第一年年底，政府将为垦殖者付出船费，并提供不少过三英亩之土地予每一名成人，该土地在20年内免缴地税，以后地税每英亩一角。如果政府有意征用已经分发的土地，须给垦殖者赔偿。垦殖者可自由种植各种农作品并加以售卖，但必须紧记种稻乃主要目标。政府将为垦殖者建造登岸的码头与小路，并协助运送货物。垦殖者将受到保护，使其安居乐业。他们可拥有若干枪枝以对付野猪。未获许

可，不得出售鸦片或赌博。政府承认由承包者所推荐之首领为港主。港主的实权只限于在垦殖区内排难解纷，如有必要，其职权将在较后时详细加以阐明。（在19世纪末叶，政府给予港主无限的权力，“拉惹”设在古晋的法庭认为无须由它解决的所有案件都移交港主，港主也获得特权在管辖区内经营鸦片烟馆、酒馆与赌馆，由此看来，那些港主与拉让的港主在权力上有显著的不同。）最后，如果两年一切顺利，承包者可再次引进垦殖者，不过必须有人担保。

黄乃裳从“拉惹”手中获得三万元的首期贷款。他与三位合伙人成立福隆公司以谋其事，然后他便返回中国招募乡亲。第一批九十一人由他的合伙人力昌又名力义成率领，于1900年年底离开中国，其中七十二人于1901年正月抵达砂劳越，余者留在新加坡。黄乃裳亲自率领第二批五百三十五名福州人由福州直接前来，并于1901年三月抵步。翌年六月，第三批五百一十一人由黄乃裳率领抵达诗巫，垦殖者在伊干河下游数哩之新珠山获得土地。黄乃裳在诗巫设立办事处，以处理垦殖区的事务。不久因新珠山土地不够分配，有些人便迁往诗巫附近的另一地区。最后共有三个垦殖区：拉让江右岸有两个，左岸一个。不像先前的拓荒者单身而来，这些福州垦殖者都带着妻子儿女而来。

在最初几年，福州垦殖场确实面对不少问题。森林是顽固的敌人，必须辛勤劳动才能开芭种地。自中国带来的农耕知识并不适用于热带的诗巫低地。环境恶劣，危机四伏。害虫、老鼠、害鸟、野鹿、野猪极多，不断摧残农作物，家畜也常受蛇的骚扰。沼泽低地容易传播疟疾、热病与其他疾病。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随着时间的消逝，黄乃裳越来越难以对垦殖者发挥他的权威。作为由他自己命名的新福州垦

殖的首脑，他必须对所欠下的债务负责，他的公司只有他与力昌两位股东。不幸的是，力昌并不可靠，即使在第一次航程中已经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领袖。后来力昌再度返回中国，随身携带借自“拉惹”的一万元新贷款。他不直接前往福州，却去香港与台湾。钱花光了，自己也生病了，他才回到厦门，终于死在该地。力昌私吞公款使本来已经负债累累的黄乃裳百上加斤，他不得不与布禄克当局谈判。为了还债，他只好向垦殖者收过路钱，照他的想法，他借钱是为了大家，因此大家有义务帮他偿还。在这方面“拉惹”的官员对他表示不满。最后“拉惹”给他两个选择，还钱或离境。1906年，建立福州垦殖场之后五年，黄乃裳病了，理想也破灭，在“拉惹”的眼中变得不可靠，只好悄然返回中国。

他本是一名书生，对农耕与商业管理知道得不多。他又过度低估了垦殖区所面对的困难和热带雨林的生态。他预测垦殖者能在九个月内自足自给，事实上那些留下来的人用去超过三年时间才达到目的。他以教徒的慈悲胸怀处事，使他缺乏宏观，以致对一些手下太过信任，无论如何，他的丰功伟绩还是不可抹煞。在十几年后，他的辛勤也结出了果实。他于1924年在故乡闽清去世，享年78岁。去世之前，他已经知道福州人于1908年在民那丹定居，1910年在泗里街、桑与加拿逸，1920年在巴南，1921年在加帛，1924年在实巴荷（民都鲁省）。黄乃裳离开砂劳越之后，一位名叫詹姆斯·胡佛牧师（亦有人译成富雅各）的美国卫理教传教士受委为港主。胡佛自1903年便已跟垦殖者在一起。垦殖区取得良好的进展。到了1910年，已是根基稳固，特别是种了橡胶之后，获利不少。橡胶种植开始于1908年。

## 粤与兴化人垦殖区

第一批福州人到达诗巫几个月之后，有两位广东人领袖邓恭叔与江祖祥请求“拉惹”准许他们带领同乡在拉让其他地区定居，他们于1901年与“拉惹”签署类似黄乃裳所签的那种协议（见附录二）。协议规定广东人定居于诗巫上游的宋溪南兰。政府划出一片土地给他们，只要他们善加利用，则无限期免缴地税。如任其荒芜，则政府有权收回。广东人不种稻而以种胡椒为主。“拉惹”答应帮助他们建立家园，每一位新到者可获得五元。政府为这垦殖区所订下的目标是五千人，每年引进五百人。这垦殖区由华人公司管理，港主，也由公司委任，有一点与福州垦殖场不同，这里的港主可以开设鸦片烟馆、酒馆与赌馆于他所管辖的范围之内。多年来，由于领导无方，使得进展缓慢，但到了1914年情形有所改变，广东人也就越界从诗巫朝向加拿逸扩张。

1911年，查尔斯·布禄克批准另一项有组织的华人垦殖计划。地点也在拉让。这次牵涉到信卫理教的兴化人。在这计划之下，三百名兴化人在一位美国传教士威廉布鲁斯特（医生）牧师的率领下自福建前来。政府拨出伊干河右岸靠近新珠山的一片土地给他们种稻。垦殖者并未要求豁免地税，只要求政府将最近关闭的古晋政府米较中的碾米机送给他们。第一批一百名兴化人于1912年抵步，即刻开始工作。在第二批于1913年抵步时，开芭工作已告完成。就像福州人一样，政府让兴化人前来也是为了要他们种稻。结果，他们种橡胶，蔬菜与胡椒，当然也种稻。他们饲养家畜家禽以供自用并出售以增加收入。他们的举动常与“拉惹”的规定背道而驰，“拉

惹”不止一次表示生气，但他们的努力很快就证明种植多元化农作物是对的，这样做不但他们自己有利，同时也对国家经济有利。到了1914、15年，兴化垦殖区已很繁荣，只是来自中国的兴化人并没有先前估计的那么多。

由此可见，政府引进大批华人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开发土地。在第一、第三省，“拉惹”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不能任由大片可供耕种的土地年长月久的荒废下去，所以必须找人前来开荒种植。第二省不受重视，因为其土质贫瘠，又无矿藏。在这里，森林受到多年的迁移种稻法所摧毁。别处的河流水势缓慢，肥沃的冲积平原容易形成，第二省的河流较短，水势较急，河床较浅，河泥甚多，造成河口潮水汹涌。第一省自布禄像第二省的华人人口只是逐年缓慢增加，起先只有一小股华人商家在政府堡垒的保护之下开店建立巴刹，后来人多了才向外扩张。

第四省华人居住地的扩张也比较缓慢。无论是在民都鲁、巴南河流域还是美里油田都没有大批华人移民，而美里油田的发展靠的是欧洲人资本。但“拉惹”见到拉让垦殖区的计划成功，便与胡佛牧师磋商，想在巴南河盆地如法炮制，结果，1913年有二十五名福州人乘政府轮船劳班号离开诗巫，前往巴南开芭。自1923年至1928年，另有福州人从拉让前往民都鲁附近的实巴荷与巴南河畔的波育。1909年美里发现石油。1910年开钻第一座油井。美里油田后来的发展吸引不少工人自各地前往美里。油田公司又从海外招聘华籍熟练工人与技术人员，就更加刺激华人人口的增长。

在第五省（林梦、老越与杜鲁山），早期的华人居民多数来自汶莱（有一些来自沙巴），因为两地有历史上的联系。他们人数不多，大部分经

商，也有些投资于种植业与饲养家畜。近年来，伐木活动与锯木工业的兴起也造成人口急增，华人企业家在这方面大展鸿图。

第三任“拉惹”查尔斯·梵纳·布禄克统治（1917-41）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一段时期内，华人移民砂劳越可说时断时续，在后来的几年更受到限制，当局只签发入境证给那些已经有亲人住在本地的个别人士。

华人移民砂劳越首先是要归功于查尔斯·布禄克所采取的开明政策，同时也反映出华人本身在经商与种植方面的才华，为新来的人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从而打下经济与社会基础。这不但是华人本身的成功故事，也是砂劳越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成功故事。自1871年以来，华人人口稳健增加可充分证明这一点。《砂劳越宪报》报导，在1871年尝试展开的人口调查数字显示，当时砂劳越总人口是141,546人，其中华人占4,947人，而住在砂劳越河一带的华人则有3,467人。1877年，英国所作的一项估计指出华人人口已增加到七千人，1909年，巴林·顾德与邦裴尔估计砂劳越华人总数约达四万五千人。如果这项口已增长七倍。1876年至1939年间华人人人口多少已无法找到可靠的数字。1939年，有人提出华人总数为123,626人，但官方的人口调查显示砂劳越总人口为546,000人，其中华人占145,158人。1959年的人口调查得出的华人总数为229,154人。起初，华人数并不引人注意，如今却已占总人口的三份之一。1970年，马来西亚人口调查提供的砂劳越华人人人口为294,020人，在将近一百万（975,918）的总人口中占三十点一巴仙。早期的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异族通婚，因为当时还未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计划，所以入境者大多未曾携带家眷。④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筹备经年的《教育指南 1994 年》今日 (28/4/94) 在副教育部长拿督冯镇安博士主持的推介礼上隆重面世。

这本通过华文推广教育资讯，以利我国教育发展的应用指南，是副教育部长拿督冯镇安博士形容为捉紧资讯爆炸时代脉搏，关心教育的私人界出版刊物。

他在今天的推介礼上指出，鼓励私人机构在大专教育上作出发展是教育部九十年代的目标，以在政府及人民的合作下，协助国家培育更多大专人才，积极发展国家迈向 2020 年的宏愿目标。

他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与教育的普及息息相关，因此，他表示庆幸我国在独立短短的数 10 年来已成功建立普及发展的教育，随着这个基础，政府目前更着重致力于大专及大学教育的发展，由此政府大专学院希望和私人学院共同合作，培育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亚太区的教育中心，吸引更多外国学生到来求学。



## 副教长冯镇安推介 《教育指南 1994》

谈到这本新面世的教育指南，他表示教育部欢迎私人界出版这类集合国内外教育资讯的刊物予社群作为升学和教育的索引和指南。

这本由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教育指南》于今年度创刊，是一本教育资讯的百科全书，教总主席沈慕羽更形容其为升学的通胜，内容概括了国内外升学指南、政府及私立学院简介、大使馆通讯录、文化中心通

讯录、图书馆通讯录、全国中小学通讯录及统计数字、国内外奖、助、贷学金的申请方法、教育部属部门及法定机构通讯录、教育谘询单位及民间团体等等。其中也收录了世界 18 个国家大专学院的简介，及我国 800 间私立学院的资料。这本教育指南将每两年出版一次。🕒

(29/4/94)

▼ 《教育指南 1994》推介礼会场一瞥。



# 张碧芳落发

## 社资料研中心筹募基



●张碧芳于5月1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她将于7月3日落发，以为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筹募基金的讯息。在张碧芳（右）向记者述说她的心路历程前，华资管委会主席陈松生律师向记者介绍华资的组织与现况。左一为游若金博士。

# 张碧芳落发

张碧芳削发不是出家  
但为了完成一个心愿  
决定为华资筹款  
忧患有许多痛伤

她以不寻常的举动  
实践很寻常的负担  
社族的灯火要承传  
它照耀共同的理想

缕缕青丝应有多少钟情  
回馈社会但求尽心尽责  
请记住在七月三日  
你来，也把朋友带来

如果作出抉择  
猜疑就不磊落  
让我们为无畏激越  
放声唱起大家的歌